

香港教區辦學的「活」史書

—— 儲富有

- 1948 年 於澳門出生
- 1953 年 入讀慈母幼稚園，及後升讀慈母學校
- 1966 年 領洗於聖母諸寵中保堂
- 1971 年 任教於聖文德書院
- 1973 年 任教於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 1977 年 任聖芳濟各書院校長
- 2000 年 任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
- 2009 年 任天主教教育事務處主教代表助理
- 2018 年 退休



(圖：儲富有先生)

訪問：區麗芳、譚惠鵬

撰文：黃奕清

自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傳教士來到香港以來，教育一直是天主教會服務香港市民的方式之一，早期的教會學校都是由來自海外的修會興辦。到了二十世紀，首間由華人管理的學校——華仁書院，由教友徐仁壽先生於 1919 年成立，隨後首個華人修會耶穌寶血女修會於 1923 年創辦德貞學校，而香港教會升格為教區後，也開始辦「教區學校」——南華中學（1946）和高主教書院（1958）。¹

儲富有踏入教育界之時，正值教區中學大量出現的七十年代。他身處教育前線的三十年間，學童人口急速增長，輕工業蓬勃發展，新市鎮陸續形成，其教育生涯，正好讓我們看見教會在這時代裡，如何回應教育的需求及教育政策的發展。儲先生與天主教教育的故事，可以從他的童年說起。

就讀慈母學校的「百厭仔」²

隨著 1949 年中共建國，大量難民從大陸逃到香港；他們在市區的空地或山坡搭建木屋，形成「木屋區」，及後出現由政府興建的「徙置區」，以應付住屋的需求。教會看見這些社區裡貧窮、衛生和教育等問題，多個外方傳教會在木屋區附近，或走進徙置區中，為居民提供救濟品，並開設診所和學校等設施。

儲富有兒時家住長沙灣一帶的木屋區，鄰近聖母諸寵中保堂³，父母很自然地把他帶到聖堂開設的慈母幼稚園上學，然後升讀慈母學校。⁴

慈母學校已經結束了，那時候是在長沙灣天主教墳場的入口處，現址為天主教墳場辦事處。學校有一間聖堂，

¹ 參「天主教教育事務處」網頁〈辦學歷史〉部分。

² 廣東話中，對頑皮小孩的稱呼。

³ 聖母諸寵中保堂位於長沙灣福華村，建立於 1952 年，其後在 1960 年劃入聖老楞佐堂，並於 1970 年正式被取消。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歷史建築探索」網頁，〈聖母諸寵中保小堂〉：<http://tiny.cc/65c34y>。

⁴ 慈母學校是聖母諸寵中保堂的一部分，屬私立學校。因著社區的轉變和堂區的發展，慈母學校已成歷史，其在區內的教育工作，由宗座外方傳教會士馬迪理神父（Pietro Martinelli）於 1960 年成立的善導小學繼承。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歷史建築探索」網頁，〈聖老楞佐堂〉：<http://bit.ly/2UveVax>；「天主教善導小學」網頁，〈校友會簡介〉：<http://bit.ly/2X3GC7d>。

名叫聖母諸寵中保堂。在聖堂旁邊用趟門隔開，有四個課室；即中間是聖堂，聖堂兩翼各有兩間課室，在另外一處又有兩間課室，做幼稚園的。

學校外面有一片空地作為球場，有一小塊有蓋的地方，可以放兩張乒乓球桌，就是所謂的雨天操場。空地對著聖堂的位置，有一個聖母山。後面就是墳場了，我們星期六、日，放假時經常去墳場玩，我們不怕的。

聖堂另一邊的山上，有一間神父的宿舍。堂區有一些修女，是顯主會的修女，她們在那裡幫忙做傳教的工作。那時的本堂神父是海澤黎神父。⁵

堂區下面以前是木屋區，現在應該是南華中學和明愛醫院那一帶，當時都是木屋區。那裡的聖堂主要照顧附近的人，以及青山道、長沙灣和荔枝角一帶的教友。

幼稚園時有修女在任教，伍秀芳修女，她是我幼稚園的班主任，另外還有一位，許修女。至於小學，全部老師都不是神職人員。

學校老師很友善的，不過有一位老師很惡，是英文科老師，會打學生，那時是可以打學生的，我也被老師打過。我也是很「百厭」的，記得曾經由一張乒乓球桌跳到另一張，被老師發覺，說這是危險動作，罰我跪在聖母岩前。雖然有位英文科老師很惡，老師們都是很用心教學的。

⁵ 海澤黎神父 (Domenico Maringelli · 1913-1989)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54 年從內地到香港服務，1963-70 年任聖母諸寵中保堂主任司鐸，同期在 1963-65 年間任慈母學校校長。他於 1972 年離港回意大利，1989 年逝世。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海澤黎神父): <http://bit.ly/2D8NDvO>。

我小學六年級時，是最後一屆香港的小學會考，應該是 1961 年，有中、英、數和社會四科。如果小學會考合格，就可以獲派到官立或者政府資助的中學。如果不合格，你要讀中學的話，就要去私立學校了。

而且不是所有學生可以參加考試的，政府會根據學校之前的小學會考成績，來決定學校的應考人數。我記得我的學校一班四十多人中，只有四位同學可以去考這個會考，我很幸運是其中一個。

慈母學校後來隨聖老楞佐堂的建立而結束。儲富有曾在聖母諸寵中保堂參與主日學，從而領取救濟品；他在中學階段 1964-66 年在聖母諸寵中保堂學道理（慕道），才領洗入教。

因緣際會下踏進教育界

儲先生在中六時遭遇父親的離世，好不容易靠政府及中學校友會的借款完成大學課程。畢業時，他既要還債，又要肩負照顧家庭的重任，因此著急找工作，卻又找不到。正好慈雲山剛剛開校的聖文德書院⁶在招聘老師，儲先生去信應徵，並順利獲聘。他在該校經驗了兩年愉快的教學生活，讓他愛上了教育工作，自此沒有離開過教育界。

那時候聖文德中學未有自己的校舍，還在興建。政府當時的做法，因為要提供很多資助的中學學位，有些新開辦的學校，並未立即用盡全校校舍，可以讓另一間新的學校，共用同一校舍。聖文德當時是未有校舍的，借用德愛中學上課。

⁶ 根據聖文德書院網頁介紹，方濟會看到慈雲山一帶新徙置區內適齡學童的入學需要，於 1968 年從美國請來丁立人（Joachim Daleiden）和司徒克（Howard Stunek）兩位神父創辦該校。學校於 1970 年正式成立，兩位神父分別擔任首任校監和校長。

聖文德是由中一開始，老師的人數少，學生的人數少，所以老師與學生的關係非常好，老師差不多認識全級的學生。那時只有四班中一，六位老師，教不同的科目。我記得自己要教數學、綜合科學、英文和聖經科，因此每一班都有教，跟學生很熟絡。第二年便可以用新校舍上課。

由修會學校到教區學校

儲富有領洗後，活躍於長沙灣基督君王堂，時任主任司鐸黃德祥神父⁷建議他到教區學校工作。黃神父認為，教區學校的發展比修會學校大；他所指的發展，除了是個人升遷的機會，也是教區辦學的發展。因此。儲先生在1973年轉到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簡稱「長天」）。

因為我在堂區服務，神父熟識我的為人、處事方法及態度等等，所以，雖然只教了兩年書，轉到長天，他已經要我做副校長的職位了。長天當時也是剛剛成立的，一開始也是沒有校舍，借培聖中學上課。

政府1971年實施六年免費教育，同時希望有更多學童能在小學畢業後繼續升學，因此許多屬教區開辦的中學，都是建立於七十年代。

你會看到，這時期之後開辦的教區學校，很多都是以邨名和地方命名的，例如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順利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屯門天主教中學，還有元朗天主教中學。

⁷ 黃德祥神父（1930-1993）生於廣州，1960年在香港晉鐸，1964-1968年間赴羅馬進修，取得教會法典博士學位，回港後任教區副秘書長兼教區法庭秘書。黃神父先後服務於多個堂區，是長沙灣基督君王堂的首任主任司鐸，亦曾擔任多間中學校長。「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黃德祥神父〉：<http://bit.ly/2X62df4>。

那時香港亦開始工業發展，歐美國家批評香港有童工。當時童工的（國際）定義，是十五歲以下，從事勞動的兒童。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⁸因為想告訴人香港沒有童工，所以他提倡九年免費教育。九年免費教育原本是1979年才開始的，他將之推前一年，由於學位不足，政府便要想很多辦法提供學位。

除了剛才提到「一舍兩校」的做法，當時政府有很多官立小學，是不受家長歡迎的，即是它們的質素比不上資助學校、教會或其他團體辦的學校，是沒有學生的。政府將部分官立小學，即那些不受歡迎的，交給辦學團體，轉做津貼中學。另外，有很多私立學校，政府認為校舍和設施都可以接受，便將之變成資助學校，或向其「買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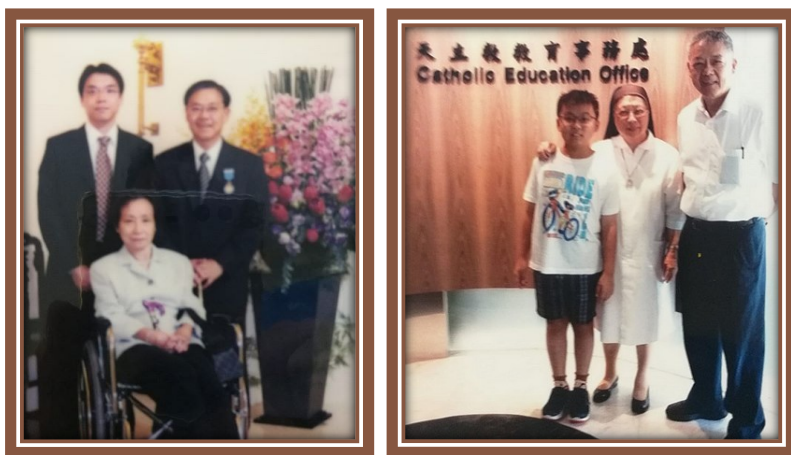
那時有「官立學校」；有廿二間「補助學校」，即戰後便開辦的，主要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學校；有一類叫「津貼學校」，即是政府給資助的；還有一類就是「買位學校」，即是私立受助學校；然後就是「私立學校」。那時的私立學校也有很多學生的，例如威靈頓、新法等等，當中有左派的學校，是不受政府資助的，例如培僑、香島和勞工子弟學校等等。所以，當時的中學有很多類型，真的是百花齊放。

1977年，麥理浩宣布九年免費教育，便需要更多津貼學校。在聖方濟各堂區內，有一間石硤尾官立小學，學生不多，政府便將該校交給天主教教區辦一間中學，就是

⁸ 麥理浩爵士 (Sir Murray MacLehose, 1917-2000) 在1971-1982年間擔任香港總督，亦是任期最長的一位港督。他在任內推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從小學一年級到中學三年級的九年免費教育及將中文納入為官方語言。

「聖芳濟各書院」。教區遂招聘中學校長。當時我有份雄心，一方面是升職，另一方面希望在不同崗位帶領學校做好教育的工作，於是申請校長一職。

在儲富有的記憶中，當年為了九年免費教育的提前推行，當局要把資助中學的數量由七十多間變成一百五十間，也就是說，全港需要多聘七十多名校長。儲先生乘此契機當上校長，參與創辦聖芳濟各書院。其時全港由官小轉為津中的學校大概有九間，當中屬教區辦學的只有一間，就是聖芳濟各書院。



(圖片由儲先生提供。圖左：接受特首頒發榮譽勳章(MH)後在禮賓府與太太及兒子合照。圖右：退休前與外孫及教育事務主教代表黃若嫻修女合照。)

由舊區遷入新市鎮

在聖芳濟各書院開校的首兩年，儲先生再次經驗「一舍兩校」，與官立小學共用校舍。走到九十年代，學校出現了重大變動，就是校舍的搬遷；這時要處理的，是「一校兩舍」的情況。這次變動，又是教會對社會發展所需的一大回應。

因為很多新市鎮的建立，首先是沙田，然後大埔、粉嶺和上水，西北區有屯門、元朗和天水圍，接著是將軍澳

那邊，計算到全港的學位是不夠的，因為承諾了九年免費教育，便要提供足夠學位。但如果在所有新區興建學校，全港又會有學位多出，尤其是某些老化的地區，都已經收生不足，例如石硤尾和深水埗。

有些私立、買位和由官小改建的學校，都是非標準的校舍。政府便建議，不如搬去新區，你有新的校舍，它有足夠的學位，又不怕有多餘學位，政府在這樣的規劃之下可以節省一點。

教區除了辦教育，也要找地方做傳教的工作，要有個根據地，有個中心點，才可以協助福傳的工作。在新市鎮，政府未必會批地給教會建聖堂，但那裡的確是有牧民的需要。於是教區便想到，把在市區一些非標準校舍的學校遷出去，聖芳濟各就是其中一間。遷去哪裡呢？考慮過幾個地方，最終選擇了粉嶺。

93年搬過去，那石硤尾的學生怎樣呢？當然可以全部入粉嶺，但對他們並不公道。教區就此有個很好的決定，讓中一已入讀的，在舊校讀至中五畢業；於是便有「一校兩舍」，要作特別的行政安排。

遷校之後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學生背景與需要的不同。當時中學施行一種不平衡的班制，就是高中的班數比初中的少。作為新校，聖芳濟各的中四級所接收的，主要是沙田、大埔，以至北區不能在他們原校升讀中四的學生，要大力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加上家庭背景比較複雜，品行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會在學校附近吸煙。

所以在午飯時間，我們會有巡邏隊，我自己也親自和老師們去不同的商場、不同的樓層「洗樓」。首要讓學生知道我們會出去看他們，他們會稍為檢點。如果真的抓到

學生回來，我們便可以做點輔導工作。另外，讓家長知道我們是關心學生的，雖然他們的品行是這樣，但我們仍然不怕吃力地去做。

學生成績弱不要緊，我們做多點 pastoral care（牧民照顧），也因此有些家長認為，自己的子女需要特別照顧，便選擇我們學校。所以，跟在石硤尾時比較，公開考試成績是不好的，但我們仍然提供全人教育，同樣有很多課外活動，讓學生有全面的發展。我們做好一點學生輔導，做多點個別的照顧，當然老師會辛苦很多。

母語教育政策

儲富有在 2000 年回到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當校長，除了基於曾在該校任教，以及所屬堂區與學校相連而培養的感情，原來也跟教區鼓勵母語教育有關。在八十年代初，政府開始提倡在中學實行母語教學，而胡振中樞機⁹ 1989 年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提出推行母語教學。

那時用母語教學是比較口號式的，政府也不太知道怎麼做，只是說母語教學，認為學生的學習會更好。教區也覺得這是應該要走的路向，我相信有個主觀願望，全港學校都這樣做，那便沒有所謂的「標籤效應」。

我記得當時在中學校長會，教區中學的校長一起商量過，我們支持母語。我們對母語教育的定義，是有超過一半的課程用母語教授；因為政府沒有界定一個標準，這是有點兒取巧，但亦不失母語教學。譬如中文、中史、倫理

⁹ 胡振中樞機（1925-2002）出生於廣東省五華縣，1952 年在香港晉鐸，翌年赴羅馬傳信大學攻讀聖教法律。胡樞機自 1957 年起服務於台灣新竹教區，直至 1975 年獲委任，成為香港教區第五任主教。

宗教、體育和音樂等都用母語，如果你認為數學是有需要的，也可以用母語，其他科目如英文、科學、經濟等等，保持英文教學。這給予家長的觀念是，我們是支持母語，但不完全是中文中學。

長天因為跟隨胡樞機的宗旨，用母語教學。很多教區的英文中學，包括長天，收生平均下跌了一點多個 Band（等級）。自此，入讀學生的能力比以前較弱，所需的教學模式和照顧不同了，也較難期望學生有很強的學習主動性，老師們難以適應轉變。教區說，反正我以前曾在這裡任教，建議我回去，協助轉回一間受家長歡迎的 EMI¹⁰ 學校，同時具備天主教辦學理想的學校。

儲先生走過香港教育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學校與地區從事教學與管理的工作，帶領學校回應不同類型學生的需要。在這一路上不變的，是他對天主教辦學理念的堅持。

雖然學生的背景和環境不同，但天主教辦學的理念、使命和願景都是不變的，就是照顧每一個學生。我認為，應該把學生教好，未必將來都能升讀大學或成為很出色的人，但我希望每位學生可以做好自己。譬如，在家裡是好的兒女、好的兄弟姊妹；將來有家庭的話，是好爸爸或好媽媽；在每個行業裡，以天主教的價值觀來做好一個人。我也相信天主創造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潛能，我在學校裡讓他們有機會去發展獨特之處。

這份辦學理念的根本，正是教會對人的看法，儲先生藉此成就眾多的莘莘學子，引領他們開創自己的人生。

¹⁰ EMI 全寫為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即是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

在明愛主理職業先修中學的建校專家

—— 李崇德

- | | |
|--------|---------------------------------|
| 1944 年 | 出生於香港 |
| 1955 年 | 領洗於聖方濟各堂 |
| 1956 年 | 入讀聖芳濟書院 |
| 1964 年 | 師範畢業，任教於荃灣聖芳濟中學 |
| 1967 年 | 加入明愛，管理聖高弗烈職業先修學校 |
| 1976 年 | 調任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校長，參與創校 |
| 1978 年 | 調任明愛聖方濟各職業先修中學校長兼任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總監 |
| 2004 年 | 任明愛教育部部長 |
| 2009 年 | 退休 |



(圖：李崇德先生)

訪問：劉卓輝、黃天賜

撰文：黃奕清

工業教育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出現於香港，為失學青少年提供謀生技能的培訓。天主教會的首間工業學校是在 1935 年建成校舍，交由慈幼會管理的香港仔工業學校。後來香港明愛成立，也應地區居民的需要，在香港仔及堅道等服務中心開設職業訓練課程，成為日後發展職業先修教育的起點。

在 1967 年投身明愛的李崇德，當過三間明愛職業先修中學的校長，見證在輕工業蓬勃的年代，職業先修學校與整個教育制度的同步發展。期間，李崇德協助創建多間明愛職業先修中學，他笑稱自己因此變成了「建樓專家」。他原本是英文老師，當初為何選擇教育這一行，及後為何毅然投身明愛，都與他在中學階段的成長經驗有關。

回答天主教教育之恩

我的母校是由修會辦的中學——聖芳濟書院，校內的修士屬聖母昆仲會¹。我在十二歲領洗，整個中學階段都是在他們的培育裡，無論是成長或是信仰，他們對我的影響都很深。尤其是後來為何選擇了教書的工作，純粹是修士對教育的投入，以及他們對年青人成長的關心，給予我很大的動力，所以我選擇了教書這一行。

我剛出來教書的時候，很幸運地修士們請我回去他們辦的另一間學校任教，因此我覺得要學習他們的那份投入感，尤其是在學校這麼多年，我絕不是聰明的學生，坦白說我的成績是很差的，都不敢跟別人說。修士對我不離不棄的態度，使我完全不會有自卑感，在學校內也不會感覺自己是次等的。這不同於在一些名校裡，優等生有更好的待遇，較差的則沒人理會。我覺得這種對年青人的培育，是我應該學習的，所以當我選擇了教育這行業時，並

¹ 聖母昆仲會 (Marist Brothers of the Schools) 在 1817 年創立於法國，是一個致力於青少年教育的修士修會，於 1949 年來港，先後創辦聖芳濟書院和荃灣聖芳濟中學。

沒刻意去尋找怎樣的教席，當他們叫我幫手時，我便答應。

同時，我一直在聖堂成長。當時輔祭會的神師郭佐靈神父，是 PIME（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²。那時他很年青，跟我們輔祭玩得很熟。他被教區調往明愛，去了香港仔明愛第一間職業先修學校，叫「聖高弗烈」。他去了那裡不久便打電話給我，約我過去跟他見面；他說：「很糟糕，我不懂教書，我不懂學校。你反正在教書，你來幫我吧。」

在那時代，香港仔聖高弗烈不是正式的中學，是一些職業訓練班。那時郭神父想我去幫他，但我已經在教一間正規的中學。我的考慮就是：要不要放棄那間中學的教席，加入明愛工作，去做職業訓練班的教師呢？

當然神父有影響，他的獻身與投入令我感動，我亦認為自己年輕，剛出來教書，可以多作嘗試，不行再算。於是，我告訴原來學校的校長。校長修士又很好人，年中也讓我離開，所以我在二月，即上學期完結後，便轉職香港仔那邊。

明愛的首間職業先修學校

香港仔明愛服務中心在 1962 年啟用，是明愛首個地區服務中心，設有漁民子弟學校，提供柴油機維修課程及女童職業訓練等，中心亦為殘障人士開辦課程，提供工作技能培訓。

² 郭佐靈神父 (Domenico Cozzolino, 1935-1988) 乃於 1954 年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1959 年晉鐸。郭神父 1961 年來港後，服務過聖猶達和聖方濟各等堂區，在 67 至 69 年間當香港仔明愛中心的主管，隨後返回意大利擔任拿坡里媒體宣傳辦公室主任。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郭佐靈神父〉：<https://bit.ly/2CL9ut>。

對漁民子弟來說，是很難適應常規教育的。因為爸爸的船除非不出海，一出海就是一、兩個月，正常的上學時間便會被打斷。他們一定要跟爸爸出海，因為在陸上沒有一個固定的住址。很多時他們讀到三、四年班便不能繼續，或者課程配合不到，惟有學門手藝，幫忙爸爸。在香港仔那些漁民子弟最喜歡學的，是修理柴油機；因為船是由柴油機推動，如果壞了，在海上便糟了，所以爸爸也很喜歡兒子學懂維修柴油機，便開這類課程。為女孩子的，開打字班等等，也是屬於職業訓練。

在那裡，原來我要幫神父從頭開始，原來學校連註冊都未做，卻已在開班教書，正式來說是犯規的，所以我以自己有限的知識去盡量幫他處理一切的行政事務。做下去我開始覺得有很大的滿足感，因為這些年青人之中，原來有一部分是聾啞同學。他們失學，因此年紀較大，有些二十多歲仍未小學畢業。當時在香港仔聖伯多祿堂旁有一間小屋，他們在那裡住宿，一班十多人，白天便來上學。相處久了，與他們打成一片，自己也感覺年輕了，而且看到他們學到一門手藝，畢業出去找到工作，可以自立。這樣做著我也感到開心，覺得很有意思。

初期的聖高弗烈是很簡陋的，幸好明愛一直都有些恩人，尤其在早期六、七十年代，德國埃森教區與香港教區結為姊妹教區³。該教區設有兒童發展基金，有一個籌款方式，就是在每年聖誕平安夜晚上，教區內的兒童合唱團去報佳音，向人收捐獻，說明是用來幫助世界其他地區內

³ 埃森教區成立於1958年，與香港教區在1961年締結為「姊妹教區」，支援香港及中國教會的發展，包括捐款協助香港教區興建三間聖堂——葛達二聖堂、善導之母堂和聖歐爾發堂，及資助明愛發展社會服務。

有需要的教區。當時香港教區獲得他們的幫助，因此每年都有些捐款是幫助明愛的。當時我們得到德國教會的幫助，學校的設施便慢慢有所改善。

職業先修教育的正規化

早期的聖高弗烈分男校部和女校部，男校部由李崇德負責，女校部由嘉諾撒修女負責。李崇德管理聖高弗烈的十年間，見證該校重大的轉變。

1967年發生暴動，事後政府有一個專責小組，嘗試找出暴動的成因及預防措施。結論之一，是由於當時的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導致只有半數小六畢業生能升讀中一。那時有個升中試，合格才能繼續升學。有半數學生，其實不一定是升中試不合格的，只是制度不容許，沒有學位讓他們升上去，被升中試淘汰。

小學畢業才十二歲，那時的就業年齡是十五歲，所以十二至十五歲中間有個空罅。這群小孩子在三年裡無所事事，不少成為街上的頑童。因此，當社會出現任何不穩定時，這群街童便與滋事份子一起生事，例如擲石頭、放「菠蘿」⁴等，原來當中有相當的人數，正是這群失學兒童。

政府為要對症下藥，請來外國專家與香港的一些有心人士，成立工作小組；他們建議政府模仿德國和北歐的制度，推行學徒訓練制度及職業教育。他們設計一個三年制的初中職業先修學校課程，由中一至中三，文科工科各半。學生進不到中一，便去這些職業先修學校，讀完三年

⁴ 香港俗語，稱自製的炸彈為「菠蘿」。

便十五歲。同時，政府開展學徒訓練計劃，讓十五歲的畢業生可以選擇參加。再者，政府配合開設工業學院，讓小朋友可以繼續讀書，白天去做學徒，晚上去讀書，與僱主簽三至四年的學徒合約，畢業後成為合格技工。

這構思是非常好的，六、七十年代香港是全靠製造工業令整體經濟能夠起飛，但人手從何來？職業訓練學校便能滿足這方面的需要。政府接納了這個報告，於1969年落實，先邀請三個教會辦學團體開始籌辦這些學校，這三個團體分別是天主教的明愛、基督教的中華基督教會及聖公會。

明愛接納政府的建議後，把在香港仔中心內的職業訓練課程，改組為三年制的初中職業先修學校，並將男校部和女校部合併，香港仔明愛聖高弗烈職業先修學校正式誕生。

改組後的首四年（1969-73）為試驗期，當局檢討認為相當成功，遂把計劃定為中學學制的一種，叫「職業先修學校」。因此，聖高弗烈在1973年轉為政府津貼中學，後來順應政策的發展，在78年由三年制改為五年的完整中學學制，改名「職業先修中學」，至1982年增辦預科班，以配合中學七年制。

與此同時，工商界團體也紛紛回應新政策，開辦同類型學校，以應付其屬下機構的人力需求。今天的廠商會中學和棉紡會中學等等，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明愛辦學的使命

明愛雖然不是僱主團體，但也著意開辦這類學校，是因為作為宗教團體，明愛看到自己在香港社會中的角色——照顧弱勢社群。入讀這些學校的孩子，都是家境清貧的；剛才也說過，兩個小朋友中只有一個能升讀中學，升不上的當然是成績不好的，但他們是否也需要有讀書的機

會呢？職業先修學校既然能提供此機會，明愛當然義不容辭，努力在這方面為他們提供選擇。

對教會來說，明愛就是替教會扮演一個奉行福音精神的機構，為弱小的服務，即是耶穌所說的「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因此，明愛得到很多善長仁翁的支持，所以一連開辦了三間馬登基金中學⁵，分別在柴灣、沙田及屯門。另外，我們還有兩間陳震夏中學，也是熱心人士鼓勵明愛，贊助辦學。那時明愛以這種方式，在 1973 至 88 年這十五年間，先後開辦了八間職業先修學校。

李崇德在 1977 年被明愛調派入屯門，開辦首間由馬登基金贊助的中學。過了一年半，新校舍建成之際，他便被調任堅道明愛聖方濟各職業先修學校校長。李先生解釋明愛把他調回總部附近，是由於當時有其他新校正在發展，需要他的協助，所以他在聖方濟各的二十多年間，一邊當校長，一邊協助明愛總部策劃新校。參與創辦多間職業先修中學的李崇德笑言：「我本來是英文老師，現在變成建樓專家」。

明愛拓展另類教育背後的推手

這個時代的「明愛人」談到明愛的精神與使命時，都不得不提起來自意大利的力理得神父⁶，他是明愛的總裁，亦是影響李先生甚深的前任老闆。

⁵ 馬登基金由若翰·馬登 (John Louis Marden) 夫婦成立，贊助職業先修學校的開辦及其他慈善的工作；馬登家族創立及經營洋行「會德豐」。

⁶ 力理得神父 (Francesco Lerda, 1926-2003)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他於 1951 年晉鐸後，在羅馬額我略大學攻讀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力神父 1956 年來到香港，曾服務於竹園的聖堂，1959 年出任香港明愛副總裁，後於 68 年擔任總裁一職，直至 2003 年逝世為止。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力理得神父〉：<https://bit.ly/2UBjOiz>。

他為人沉默、善良及腳踏實地。明愛開始時，辦公室只有五名員工，他是其中之一。到今時今日，明愛有六千多名員工，而在他去世時，已有四千多名員工。在他任內的三十多年，明愛的發展是一日千里，但他從不接受訪問，不會在報章上看見他的名字。

他對於人的看法，即何謂天主的肖像，何謂尊重每一個人，不是用口說的，而是以行動來做給我們看。他不但對待所有員工一視同仁，而且對越高級的職員，越是平淡，但對基層和庶務的同工，他十分尊敬及熱情對待。例如，每年通常年初四開工，我們想到寫字樓向他拜年，他會婉拒，說沒空，但轉個頭吩咐人為他安排，把所有「阿姐」（工友）都請來，集合在一個房間。我們起初都不曉得為甚麼，原來是他要主動向她們拜年。他是反轉來做的，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謙卑自下，他要服務最低層的人，便由自己的機構和辦公室開始。他做給我們看。

另外，他每年會邀請我們到長洲，像避靜般，但明愛的同事，十個有八個都不是天主教徒。他捉我們去長洲過三日兩夜，不是避靜，而是一個退修活動，由他自己主持、定主題和討論範圍。每年做甚麼呢？他總是圍繞著一個話題，簡單來說，他要我們每年集中談明愛精神。何謂明愛精神？即是明愛在今天的定位是甚麼？社會的需要是甚麼？我們應該做甚麼？我們是否需要改變？我們是否察覺到社會上有某些需要？我們有否忽略了某些人的需要？他長期地，每一年都要求我們做這件事：檢視、反省自己的工作，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滿，要不斷反省。

大家看見今天的明愛，教育、社會福利樣樣都做，尤其在以前，我們被人家批評心口繡個「勇」字，為甚麼呢？因為很多政府的新項目（new project），未有人做的，政府想找些機構做白老鼠，成功便去做，不成功便算數，那時力神父都很願意接辦這些新項目。例如現在很出名的「向晴軒」，專門收容遭遇家暴的婦女，作為中轉站，起初是社會福利處的pilot project（試驗項目），明愛接辦。職業先修學校也一樣，那時是pilot project，讓我們試做，不成功便作罷。他正是願意接辦這些項目，覺得只要這件事為社會上某些人是有需要的、是有用的，他便不介意去接辦。

這對我們來說，尤其我自己是教友，我覺得這是真正活出福音的精神，不是用口說的，是實在地做的。明愛的服務和教會一向都說的，我們不分種族、國籍、宗教，所有人都是弟兄姊妹，那麼我們究竟是否這樣做呢？

「忠誠勤樸，敬主愛人」的教育理想

我為明愛的學校訂立校訓，多間學校都用同一的校訓——忠誠勤樸，敬主愛人，沿用至今，這是我個人在信仰中摸索出來的教育理想。教育年青人修身立德，要以「忠誠勤樸」為原則。「忠」是忠於自己的理想，「誠」是做人的正直 integrity；年青人不勤力便不會有成就，即「勤」；有了成就也不要驕傲，要樸實一點，即「樸」。

我認為「忠誠勤樸」這四個字是做人的態度，「敬主愛人」是做人的目標。我們作為一間天主教學校，信仰的傳遞是必要的，因此一定要教學生認識天主；「認識天

主，愛護他人」就是我們教育學生的最高理想。所以這八個字，既是小弟的貢獻，也是我的理想。

李崇德總結在明愛近半世紀的經驗，談到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看見本來被遺棄、被稱為失敗者的青年，因著明愛的教育，有些成了小型工廠或小店的老闆，有些成了工程師和律師等專業人士。李先生不奢望學生們都能飛黃騰達，但願他們有機會發展各自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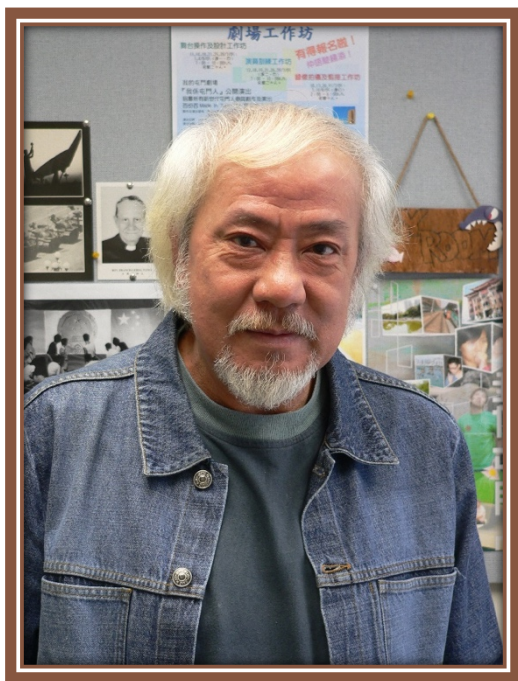
我們要做的，是幫他們轉化生活環境，從不穩定變成穩定，便已經很好了。至少他們離開我們時，不會去偷呃拐騙，不會去作奸犯科，會腳踏實地做人，面對自己將來的生活。我常常看見他們回來時，都是拖兒帶女的，一家人回來探我們，很開心。

因此，我在明愛四十五年，一生在明愛服務，我覺得是天主的恩寵，是一份祝福，若非如此，我沒有機會履行福音的精神。

另類明愛社工

—— 鍾炳霖

- 1946 年 出生於香港
- 1956 年 領洗於聖德肋撒堂
- 1967 年 受僱於香港電台
- 1972 年 加入明愛工作
- 2007 年 退休



(圖：鍾炳霖先生提供)

訪問、撰文：陳樂信

退休社工鍾炳霖在香港明愛服務卅五年，一直專注於青少年發展及輔導工作，同時積極關注社會事務，見證教會與明愛，這個面向社會的服務機構之間的微妙關係。

鍾炳霖 1946 年出生，家住旺角，十歲時隨母親在太子道的聖德肋撒堂領洗入教。當年除了鍾父，一家大小在同一天領洗，而後來鍾父亦在臨終前皈依天主。

很有趣的，我媽媽這樣說，找些「鬼佬」¹神父來嚇下我。事實上，當時我覺得，我自己眼見，其實嚇不到我的，神父同小朋友玩，小朋友們爬聖德肋撒堂那道鐵閘門，他又抱他們下來之類，好 friendly（友善）。其實是她驚我們幾個（孩子）學壞。

鍾炳霖在公教家庭裡成長，同時在「海星學校」²和「德仁書院」³這兩所天主教學校讀書。談到中學時期的信仰生活，他認為學校有的並非宗教生活，只是教會的辦學手法而已。

德仁以前是間好學校，是華仁的老師自己出來開辦的，自己跟隨華仁的做法，包括校服，號稱自己是天主教學校，入門口有個聖母像。

它的宗教氣氛比較淡，不過就好嚴。它學了宗教辦學嚴的地方，就是教務主任拿著藤條，在走廊，你知道以前的課室外面有個走馬騎樓，他走過，把藤條收在身後，你一作怪，他就進來，進來就打手板，即是很 harsh（嚴厲

¹ 香港人對西方人的稱呼。

² 海星學校由方濟會修女創辦，為何文田新徙置區的學童提供教育。學校於 1958 年由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接辦，至八十年代末收生人數持續下降，最終於 1992 年停辦。參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231-232。

³ 德仁書院已於 2006 年停辦。

的) 那種教育。但是就沒有宗教生活，它給你看到的宗教，是聖相之類。

聖德肋撒堂的堂區生活

領洗兩年後，鍾炳霖開始參與堂區活動。他十二歲加入聖母軍，主要工作是售賣《公教報》，及至年紀漸長，便負責探訪聖母軍輔助團員⁴、探訪醫院病人和教主日學等工作；這些參與，在他十八歲升上成年支團後繼續。直至廿二歲，由於搬離社區及電台工作繁忙，鍾炳霖才離開了聖母軍。

現在九龍明愛那裡，以前旁邊有一棟，有三、四層是神父住的，有一個 hall（副堂），是頗標準的羽毛球場的禮堂，正式的比赛也在那裡舉辦，亦有個 stage（舞台），好像現在的 school hall（學校禮堂），當然是大一點，星期六晚會放電影，最後面還可以擺放兩張乒乓波枱。我們即使未做聖母軍時，已經在那裡玩，因為在那兒玩，就被人 recruit（招攬）了。

當時都不大理會，十二歲入青年支團，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總之，開會、念經，每人要買一本《聖母軍手冊》，很大本的，中文版，而且是硬皮的。我所屬的青年支團，主日在副堂負責一個流動圖書館，我就是在那裡看到很多青年與神修的書籍。那時我看的《聖經》是中文版，長大一點的時候，拿著本英文彌撒經書望彌撒，追隨祭台上用拉丁文的神父讀經，都頗辛苦。

做聖母軍後，慢慢覺得自己有點不同，其實那是一個 social group life（社交生活）來的。因為加入了聖母軍，

⁴ 輔助團員主要在家祈禱，藉以給予「活動團員」支持，是聖母軍的精神支柱。

有些比我還小一、兩年，十歲左右，已經是青年支團，我顯然是大哥哥般。團員十八歲就要進成年支團，如被選任青年支團團長會再派回來。與其說宗教生活，在我身邊的人，感覺上是社交生活多些，少年人都是這樣。只不過是念經、去聖堂、賣報紙、清潔聖堂、探訪。

在與一些較年長的團員交流探訪輔助團員的經驗中，鍾炳霖感覺到大家都曾遇到的成長與宗教思維的衝擊；當遇上「冷淡教友」輕慢的挑戰時，團內的弟兄起了支持的作用。鍾炳霖也談到在聖母軍青年支團時期的社群化對自己有益，亦令他較早熟，但神修生活實在太淡。

還好，那時每周六下午在聖堂主堂內有信仰及生命講壇，由劉榮耀神父⁵主講，有公開討論。由於劉神父主講形式生動活潑，沒有禁忌，除了討論信仰生命，也涉及世界大事，很受歡迎，每次都有坐滿主堂約一大半的參加者，我每周六都跟隨母親去捧場。在公開討論時，一些較年長的青年每每對劉神父提問，有些很有挑戰性的，引致神父和青年、青年與青年之間唇槍舌劍，大家不以為迂，我從中得益。

及後劉榮耀神父被調走，聖德肋撒堂找不到另一位可取代的神父，找來了當時駐鄧鏡波學校的慈幼會士余秉昭神父⁶主理神修講壇。余神父雖然不及劉神父充滿活力，但他溫文爾雅，中外古今見識廣博，兼資料豐富，在原班

⁵ 劉榮耀神父 (1908-1986) 出於香港，1934年晉鐸後，在海豐和惠州工作，至1947年回港於堂區服務。劉神父擅於音樂，是教區的著名作曲家；他在教會推行禮儀本地化之下，致力創作中文聖樂，對中文聖樂的發展作出極大的貢獻。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劉榮耀神父〉：<https://bit.ly/2DhuY0X>。

⁶ 余秉昭神父 (1921-2000) 生於澳門，1942年加入慈幼會，1952年於香港晉鐸後，主要服務於香港教區內的慈幼會學校，並曾任聖安多尼堂助理主任司鐸。參「鮑思高慈幼會」網頁：<https://bit.ly/2GsIBLs>。

講壇支持者以外更吸引了另一批擁躉，公開討論亦較為融洽。自此，我曾有大半年定期到鄧鏡波學校找余神父聽輔導和辦告解。

不知道當時有沒有其他堂區及神父能負責這類開放性的信仰生命論壇，放之於今天，世事多元兼對立，為只在彌撒中單向講道的神父們，相信是極大的挑戰。

中西薈萃的堂區

聖德肋撒堂位處九龍塘，建堂時附近已是個花園洋房式的高尚住宅區，有不少外籍人士居住，形成中西結集的一個天主教生活群體。

我們逐漸長大都覺得，很多「有錢佬」在那裡望彌撒，李業廣都在那裡望彌撒的，你知道李業廣是誰嗎？是財經界很厲害的人。還有一些演藝界，有人見過尤敏、羅蘭。曾慶文神父兩兄弟和康建璋，這三位神父，那時女教友們見到他們有如「糖藕豆」⁷般，我看著他們被女教友迫到埋牆。

那兒是西化的，西化而有錢，以及有外國人，真的很多外國人，菲律賓人和其他國家的人。聖德肋撒堂不時都有巡遊，如聖母聖心、耶穌君王之類。除了有外國人參加巡遊，聖母軍及其他善會都有英文支團，都有外國人擔大旗。走在他們中間，加上背景一帶的低樓層洋房，一時會覺得身在外國，與走在油尖旺區的感覺截然不同。

當時聖德肋撒堂有三個入口，除太子道那面有巴士到，另一邊就是窩打老道。我小時在聖母山那面的窩打老

⁷ 廣東話，一般形容人與人的關係十分親密，形影不離；這裡的意思是，女教友們常常黏在三人的身邊。

道入口賣《公教報》，那裡很多由尖沙咀開出的七號巴士經過，很多菲律賓人及外國人在那兒下車，特地來聖德肋撒堂望彌撒。那些菲律賓人不是現在的菲傭，是很「身光頸靚」⁸的，很摩登、很有錢、很前衛的。當然有些看樣子是「band 仔」⁹，我雖然年少，也分辨到是 band 仔來的。

那個地方附近有喇沙、有瑪利諾、聖羅撒，在裡面讀書的，各類「好叻」¹⁰的人都有，又有 foreigners（外國人）。這使聖德肋撒堂變成是一個，很有趣的，華洋雜處的地方。在參與彌撒的教友中，基本上都會有一班來自附近、夾雜中、外、混血的學生和家庭。我們在聖堂如果被派到負責維持秩序，有時都要講英文。

你知道那時的彌撒全部都是拉丁文，就算拿著本彌撒書，好厚、很大本、燙金邊的，很多人都是拿著串玫瑰念珠在念。即是，他有他在念《玫瑰經》，上面有上面在做彌撒，到時候就站起身、跪低；都無得對答，都是拉丁文來的，唱的歌也是拉丁文，有一、兩台英文彌撒，但分別只是講道用英文還是中文。

其實，中國人社會的價值在那裡還有很多。我見到有人在牆腳插香，也有的用元寶蠟燭來拜，當然不多，久不久就會見到。有些「婆仔」還會裝完香就進入聖堂望彌撒。

⁸ 衣著打扮光鮮的意思。

⁹ 對以樂隊形式表演的男性的稱呼。

¹⁰ 很棒、很聰明的意思。

明愛工作三十五年

鍾炳霖在香港電台從事播音工作數年後，在 1972 年加入香港明愛，直至退休。他坦言當初只是想做一些關心社會議題的工作，並不知道社工確實是怎樣的一回事。他首先服務於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內的小組及社區服務單位（當時一般稱為青少年中心），入職翌年已經主動向上司自薦兼做社區發展的工作。

我其實不是太知道明愛是做甚麼的，都不知道社會服務是做甚麼。我是純粹很想由電台走出來，我被它困了幾年合約，日日講到我口水都乾了。我又不是完全不知道社會上的事，因為那段時間，又有反越戰，社會上有很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由大陸走來的人士，住街邊紙皮屋，包括老人、兒童、失業和貧窮等這些問題，你路過都見到。

我本來是很想做那類工作，那類工作在我入了明愛之後，才知道是要用社會行動或者社會組織的方法可以做到。

在我工作的辦公室，除了是青少年中心的辦公室外，隨著服務發展，也加入了社區發展隊，於是，便同時是社區發展隊的辦公室了。我跟上司說，我可不可以兼做兩個單位的工作？除了她同意外，當然亦事先得到了社區發展隊的督導同意。我想明愛歷史上只有我一個是這樣，以後亦沒有同時在兩單位服務的前線工作人員了。於是我就開兩邊的職員會議，做兩邊的工作。

那邊是做一些社區發展的，譬如九龍灣，那時還是爛地來的，仍是 squatter area（木屋區）、resite area（安置區），及觀塘茜草灣、復華村等。而這群人的前身，是在明愛東頭邨裡做關注東頭邨廁所事件的；因為那些邨的廁

所是沒有門的，女孩子被人非禮、被人偷窺之類。即是關注類似這些社會問題，其實我想做這些。結果，我在爭取環境改善的九龍灣安置區和爭取九年免費教育的行動中幫手。除了參與策略及推行，我更曾將一些歌就九年免費教育重新填詞，給不同區的社會行動參與者唱，唱通街，凝聚力量。

但同時，我兼顧我平時的青少年工作，搞社交舞，開結他班，都有意思的，帶小朋友的圖畫組，小孩子組員大帶細地互助，很有家庭氣氛。牛頭角明愛季刊出版義工組及其他義工小組，會寫文章關注時事，後來的人稱之為 Social Concern Group（社會關注組）。

當時明愛正在發展，仍未發展成老人服務的先驅老人服務組群就依附在我們青少年中心內，以每周兩個下午運作，招待七、八十位老人家，我又被分派在老人組工作。當時我亦以特別活動，如民歌晚會、音樂會或分享會等方式，帶人們去看社會在發生甚麼事，睇返越戰、爭取中文合法化的過程等，我也在自己所帶的青少年小組中，放這些內容。不過那段時間很短，大約兩年，然後我去了讀書。

我由一個有些人很羨慕，生活像是多姿多彩，又高人工的電台播音員，轉做一份當時少了成千元的工（當時一般文職只每月三百多元人工）。我去求職的時候，給我面試的高層說：「嘩！你人工還多過我這麼多，你走來做甚麼？」我說：「我相信我喜歡這工作，昨天經過洗衣街，還看到一位老人在街邊紙皮屋的小櫈上，很小心地吃著恐怕不多的食物。我問，怎麼會這樣？」

服務所有人的天主教機構

明愛作為天主教會的社會服務機構，鍾炳霖認為機構內的天主教氣氛並不算濃厚，這是很自然的，皆因「明愛在它的宗旨裡說明是不分宗教的，所以它不 sell (推廣) 宗教」。

機構的宗旨是這樣寫的，那你就這樣 lay down (制定) 你的目的，也就是配合了所有源於基督宗教文明的社會服務的理念和目的，是以人為本，沒有偏私的。明愛接受政府約百分之九十資助，政府會看你在推行服務時的人手與時間投入是否符合你的服務承諾，即是政府沒理由給你錢去傳教。不過，就有機構形象 (corporate image) 和社會服務理念這些東西。明愛打著天主教愛與關懷、倡導公義和平這些源於基督文明的理念，實踐得好，便傳達了天主之愛的訊息，亦滿全了天主的旨意，使需要幫助的人接受幫助及最終能得自助自主的尊嚴。

很多教區人士以至神父對明愛有誤解，嚴重的會以為明愛是教區的附屬品，或以為可以在明愛取得優惠，以為教區可以隨便調動明愛的資源。鍾炳霖舉例，某區一間小學來了一位新校長，聽說在教區有點聯繫，希望鍾炳霖派同事每周一節到校做福傳課。

當然不可以，她便到明愛總部投訴，說天主教單位也不幫天主教小學做福傳。總部大惑不解，但也要來電調查。還好，我負責的這個單位所屬的堂區神父是這中心服務諮詢委員會的神師，便由他出馬，向該校長解釋：其一、社工的工時投入 (input) 並無福傳這項，難以算入服務時數，除非說謊，或逼人做義工；其二、她說她的老

師很多不是天主教徒，難以做福傳，其實，明愛天主教徒社工佔比例也很少，大家處境相同。

雖然明愛服務不分宗教，而員工亦不一定要是天主教徒，我當時的上司、高層也不是，當時機構的財務秘書甚至是回教徒，天天在辦公室到時到候都伏地做他的膜拜。但其實大家都知道，明愛是存在著作為教徒而獲得升職，或不合學歷資格聘用的優惠的，有傳有些人是為了升職而去領洗，這情況在早期制度未建立得好時明顯有發生。故此我對於自己是教友身份低調處理，亦秉承機構宗旨，對不同背景的同事一視同仁。對新入職同事，在 orientation（入職導引）時，明知他是天主教徒也好，我都會對他們說，明愛是一個 social welfare agency（社會福利機構），社工以社工專業去服務，教友亦然，不分國籍、不分宗教；至於如何以天主教教義影響受眾，那是個人的本事，但提醒所有同事遇到墮胎的個案時，要緊守機構尊重生命的立場，免做墮胎轉介。

事實上，為容納不同宗教，深化認識宗教與人生，有一段時間，明愛曾和堂區合作，揀適合的服務單位和適合的同事，負責與服務受眾建立一些「靈修小組」。這些小組，真的是不分宗教，有天主教、基督教，甚至佛教都可以參加的，旨在探討人生、幫人自省，即使你是佛教徒，大家都會有些共同的想法。但是只維持一段短時間。

明愛還有其他與堂區合作的事工，甚至在各正式服務以外有間歇召開堂區工作統籌小組。然而，鍾炳霖看不到實質上有明愛社會服務跟教區融合的計劃步驟的做法，甚至有人虛報實況，使他毅然退出參與。其實明愛與堂區關係，受制於宗教與專業，以及明愛這服務單位遍佈港九

新界的大機構的綜向及橫向管理的矛盾與隔核。至於明愛內部用人以宗教背景作為優惠考慮，到最近似乎陰魂不散，死灰復燃，以至一些人事升遷拖延，相信亦一定程度上影響服務。

鍾炳霖加入明愛時，宗座外方傳教會力理得神父（ Francesco Lerda ）已是明愛總裁，他認為力神父既強調明愛服務的宗旨，又沒有降低和淡化其宗教性。

他是我相當尊敬的神父，是他帶給我們所謂的「明愛精神」。現在你問明愛那些人，沒有人會講，甚至覺得好好笑。他常常所謂「派麵條」，即是訓話，講的都是如何 care for community（關心社區）、如何 serve（服務）人、先知與僕人角色、無盡發展 eternal development、參與 participation 及解放 liberation 的循環軌跡等，自己做社工，要如何 diminish（縮小）自己的 self（自我）以實現服務對象的自主自立。他當時所說著的，已類似解放神學，部分相似現代摩登術語之充權 empowerment。

他也頗重視神修；例如，我們有活動是跟他一起的，他一定會開彌撒。我們去明愛的營地做 Annual Camp（周年營會），他一定在那兒做彌撒。而且，其實他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就會去明愛的營地，他就在那裡住，在那裡開彌撒。

他不是 playdown（淡化）宗教，他一方面講社會參與，但從來沒有降低宗教的重要性。反而因此在提供服務時，同工在履行專業服務宗旨時，在理念上得到宗教的和應與支持，使之更為堅實，對「打份工」意識肯定有抗衡作用。這是他的繼任人沒有做的。

面對社會轉變與挑戰的明愛

以前與社工行家閒談時說起，說明愛是第二個 SWD（社會福利署），意思不是說它跟 SWD 的做法，而是規模大到好像第二個 SWD。有一段時間明愛是站得很前的，又大，有些人又 outspoken（勇於發言）。這是早期的。

我覺得有時明愛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宗旨頗硬。因為同期發展的，你看其他機構，例如看 Lump Sum Grant（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他們千奇百怪，為了省錢甚麼都做得出的。明愛就不是，即是堅持，寧願自己想辦法「搵錢」，就不會虧待自己的同事。明愛是在一筆過撥款推行早期，唯一一間沒有跟社署薪級表脫鈎，仍然跟著同一個薪酬制度的機構。不過慢慢，當然裡面一些好細緻的行政事務，就好難解釋，例如慢慢變了不是 permanent staff（終身制僱員），都要請 contract staff（合約制僱員），如果請 contract staff 就有很多 loophole（漏洞）可以走。

我是「企得硬」¹¹ 的，譬如屯門有幾個單位都是我一手一腳開的，例如青少年綜合服務、外展、容圃中心。剛好那段時間是 Lump Sum Grant，數年下來，其他一些服務隊伍被 cut（裁撤）得肢離破碎，機構其實對我的人手虎視眈眈。但我可以「企硬」支持下去，這當然是要明愛支持，我的機構、我自己的上司支持。

明愛曾經有過一段堅持於社會和政治參與的日子，但在大環境的轉變下，也逐漸改變。他經驗過高層在不同時期對前線工作的施壓，都與

¹¹ 堅持的意思。

社區發展這類爭取權益的行動有關。他認為這跟教會和資助來源有關係。

早在我還是在牛頭角明愛負責兩邊單位工作的時候，社區發展那個上司，被我們大老闆召去問話，當然不是大老闆的意思，是教區以至政府的意思，責其走得這麼前、搞這麼多事。她自己見完回來說：「我沒辦法，那時我唯有不斷哭，我答不到他。」那壓力是多厲害。

在我退休前，亦知道因為有社區中心同事參與抗議遊行而令高層被社署署長當眾訓示。明愛社會服務是受社署資助的，壓力是在那裡。至於，有多少是教區的壓力，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長期的 struggle（掙扎），一直都爭取做社會參與、社會關注，有一段時間是相當「勁」，人人都知道，行家都知道，有好多行家都羨慕我們的堅持。但慢慢地，時移世易，人事變動，一代一代不同了。

我離開明愛的前七、八年開始，得到明愛整個青少年及社區工作服務及其屬下十幾個單位的支持，各單位抽一個社工同事，成立了一個關於青少年關社工作發展策略的協調小組，推行在服務層面及地區單位的青年關社工作。如此抽調人手，而且老實說，關社並非各單位的路向，長久下來，雖要應付統籌、游說及反彈的壓力是很大的，但我始終「撐住」，因為青年關社不可不做，一定要做。但慢慢我走了，後來聽說，「撼下撼下」¹² 這架構、這類事工就沒有了。是否沒有人像我般「企得硬」呢？我不知道，他們有多支持這個方向呢？好明顯是慢慢走向輔導，現今人們最受落的輔導。

¹² 「撼」是一種細微的動作，把東西撕去、剝掉；「撼下撼下」就是逐小逐小減去的意思。

最近他們出版了一本書，我有幸，都算是書裡面受訪問的其中一個經驗社工，但整本書都是談輔導。我當然做過很多輔導工作，我做處理邊青的外展、做吸毒問題、精神健康等，我為何不做輔導呢；我也可以說我做輔導都「幾叻」，我經常要督導在我不同單位的下屬做輔導。我不會說輔導不好、不重要。但我覺得，青年關社應該獲得同樣的關注，也就是有沒有人會出一本關於明愛社會關注的書呢？只會出一本書是關於輔導。我跟同事說，這可以反映現在走的是甚樣的路。或者有待將來吧。

除了明愛，鍾炳霖也在其他平台上，燃燒他關心人、關注社會事務的心火。自九十年代起，他一直參與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並擔任過多屆主席。退休後的他依然忙碌，時而參與正委會的研討會，時而參與遊行示威。在日益嚴峻的社會環境裡，鍾炳霖依舊本著良心「企硬」。

與勞動人民一起的農家小子

—— 華天祿神父

(Fr. Paul Vallat, MEP)

1939 年	出生於法國
1966 年	晉鐸，到越南服務
1977 至 1994 年	到香港服務，在工廠打工、從事基層工作
1983 至 1991 年	任公教職工青年會（工青會）神師
1994 至 2000 年	任國際公教職工青年會（IYCW）亞太區神師
2014 年	榮休



（圖：華天祿神父。圖片來源：公教報，攝於 2016 年）

訪問：陳樂信、黃奕清

撰文：陳樂信

晉鐸逾半世紀的巴黎外方傳教會華天祿神父，無論兒時在法國家鄉，抑或正值動盪的越南，還是來到香港，一生都與勞工和基層家庭在一起，與他們生活，並向他們學習。認識華神父的人大多稱呼他「華仔」，這正表達了他是一位謙卑、與人親近的牧者。

農家小子

華神父出生的當天，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布開戰的那一天。他的父母本來務農，養活一家八口，但後來在工業化及現代化的潮流下，他們也要到工廠工作才能夠維持生計。

我在1939年出生，當媽媽聽到開戰我便出生了。爸爸因為要當兵，已離開了家庭。那時候為人父母，甚至做人，都很困難。

我父母都是農夫，與我們六個兄弟姊妹住在法國東北部的鄉下，一家人憑自己的勞力都足夠應付生活。後來社會有很大的轉變，農民有多努力都「搵唔到食」¹，周圍都變成公司，但是我們不能夠建立一家公司，我爸爸要到隔鄰的一間工廠打工，才可以養家。

再次成為小孩子

華神父成長的環境，跟歐洲大部分村落十分相似，他的鄰里都是教友。雖然他年紀輕輕便順利進了修院，但在聖召辨別的過程中，也有搖擺不定的時候。

我開始做輔祭，也有意做神父，我入讀小學時已經有這個念頭。我們整條村都是一個團體，信仰生活為大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讓我覺得做神父很好。當時只是一個夢想，小學畢業後升讀中學，就在那時進入修院。

¹ 廣東俗語，即不能維持生計的意思。

我在中學讀哲學和神學，在十九、二十歲的時候，也有一點懷疑：是否真的要當神父？天主總會尋找你走向正路，我繼續朝這方向去。

而且我想過有些神父並非留在法國的，而要去到遠方，去未有信仰的地方，找未認識耶穌的人。那時透過與天主的關係及祈禱的生活，我感得福傳未必要留在自己的家鄉，未必要留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天主要你去哪裡，自己並不知道，在適當的時候回應天主便是了。

就這樣我有了一些方向，或是進苦修院，或是去傳教，到不認識的地方，可能要再次成為一個小朋友，學習語言及另一個民族的文化。最後我作出的決定，就是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因為這個團體是去亞洲的，是離開我們很遠的地方，很不同的地方。這是一個大的挑戰、好的回應。

當年傳教會的習慣，是待修生祝聖為執事，才安排他們的去向，而這時修會決定派遣華神父去的地方，正是他最不願意去的——越南。

那時候會長讓我們按個人期望，提出想到那裡，並且可以給予意見。我去哪裡都可以，只有一處地方不想去，就是越南。越南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我不想去曾經是法國殖民地的地方，去印度、日本、韓國或中國都可以。

我不想去法國控制過的地方，因為傳教未必順利，而且事實上在越南，很多人不喜歡自己國家曾經是法國殖民地的這段歷史。最終，我竟然是派往越南！那時，當地正在戰爭中，我的家人很擔心，問道：「那裡多年在打仗，你去做甚麼？」

讓人成為自己的導師

越戰發生於 1955 至 1975 年間，華神父於 1966 年到達越南，在胡志明市堤岸服務平民區內的華人。成為傳教士之後，他首先體驗到的，是一個新的學習過程。當他跟當地人的關係越深，越察覺到不公平的情況及種種的社會問題。作為他們的朋友，華神父思索如何與他們同行。

在越南很多人要當兵，特別是平民和窮人。如果你有錢，就可以避免，但平民沒法子，因此有很多寡婦。我在越南接觸的區域，就是那些平民生活的地方。

越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好在哪裡呢？在平民區裡，你到哪條行、哪個區，人們都很歡迎你，尤其是如果你懂得他們的語言。平民區很多人講廣東話的，潮州人、客家人、廣東人、福建人，人人都講廣東話，所以我學廣東話，又要學越南話。

那時，我看到自己的不足，需要別人帶領的、要向人學習的，不只是語言，也是生活，也是認識別人。也就是說，不是你到那裡做老師，而是別人做你的導師，學習就是謙下自己。你要成為他們的近人、朋友，一旦成為朋友，他們便會帶你深入他們的生活。在那裡，我看到貧窮、疾病和眾多的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沒機會上學，我跟一些人安排民眾識字班，為小朋友提供基本的培育：讀書、學習語言和遊戲。這些事並非獨自一人能做得到的，一定要和一些人一起關心他們。民眾識字班有本地的青年，他們很多不是教友，不認識這個區，甚至未去過，只知道是貧窮的地方。他們

知道我住在這區，因為你在那裡，有些人跟你去，而他們也成為那些家庭的朋友，即是建立關係。

到了 1975 年，越共奪得控制權解放越南，華神父見證這個大時代。當很多人選擇離開的時候，他選擇留下，卻又事與願違。

所有人都要憑雙手謀生，以前做的事現在都不能做，沒有人去打工，全部要去挖地，我也跟著一起去挖，這就是解放的生活，生活中的事和經歷，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好、愈來愈密切。我經歷過很多辛苦的事，不過能與人們在一起，都顯得十分值得。

有些人一解放便走了，我則因為解放，更想留在這個地方。不過由於我是外國人，始終被趕出來了。我在越南經歷了十八個月的解放生活。

華神父用盡各種理由和方法嘗試留下來，但最終於 1976 年被迫離開越南返回法國，在當地協助安置越南船民。

走進香港工廠，與工人做朋友

華神父 1977 年再次被派遣，來到香港。這裡是另一套的生活方式，跟越南截然不同。他當時對香港有這樣的印象：

我初到香港時，驚覺這裡有很多東西是「假的」！假髮、路邊攤檔的假花、茶樓內五顏六色的塑膠用品，還有茶樓樓梯長長的紅地毯，而且人們會跟我說英文，感覺上很陌生。

華神父在香港服務的第一個堂區，是柴灣海星堂。他在牧民工作的初期，多次碰壁，對香港的人情冷暖，又有另一番體會。

第一個經驗是，我遇上一位女生，十七歲左右，她流著淚來找我，哭訴學校跟她說：「你不行，要到另一間學校。」

我認為一個學生如果成績不好就要教好，要協助他改善，培育他。如果只跟她說：「你不行，要去另一間學校。」這樣會令這個學生很失望。我跟這名女生去找她的校長。校長是一位修女，她跟我說：「神父，你不懂，你不要理會她，她一定要去另一間學校。」這次對我來說並不是好的經驗。

另一次經驗是，我和一位修女晚上八點半去探訪窮人。探訪的家庭會說：「神父，你很清閒嗎？我們都未放工。」或者，他們會告訴我正在洗澡，還未吃飯。我感覺像是在阻礙別人，他們還沒有準備要和我建立關係。

就在那時，華神父決定不要留在堂區，因為堂區通常都要兼顧學校事務。他開始投入工廠生活，接觸基層工人，親身去福傳，以行動表達天主的愛。

我去了一間塑膠廠做玩具，另一間是做文具的。本來主教想安排我當海星堂的本堂神父，但我已經進了工廠，而主教也知道我在打工，半日在工廠，半日在堂區。當時的主教胡振中親自問我：「如果你願意，就做本堂，如果不做，請通知我，給你一個星期考慮。」一個星期後，我跟主教說：「我希望繼續在工廠工作，你派我去有工廠區的地方就好了。」

於是，華神父獲調派到新蒲崗善導之母堂。在 1977 至 1994 年間，他從事過不同行業的工作，包括製衣、機械、電子等，曾駕駛小型貨車送貨，亦曾經歷過遭人解僱，和他一起的工友們大都不知道華神父的真正身份。

我去打工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我是神父，我不會在工廠傳教「講耶穌」的。他們只會覺得「鬼佬」失敗了，來這

裡打工。後來他們看到我在伍華書院出來，會問：「你在那裡做甚麼的？」他們才慢慢知道。

華神父以工人的身份與工友拉近距離，並且建立互信的關係，大家都樂意和他分享生活的瑣事！

向青年工人學習

早在五十年代「公教職工青年會」² 這個教會組織已在香港成立，目的是協助職工青年們發現生活的真實意義，並使他們也負起責任去尋找改善實況的方法。八十年代時，華神父成為了這個在職青年運動的神師。

從 1983 到 1994 年，我一面在工廠打工，一面做公教職工青年會的神師。這個運動的特點，不是從上而下由神父計劃，而是由工青他們計劃。工青會有他們的領袖，在不同的區域有他們的負責人。

我在那裡有很深刻的體驗。工青的理想是，每個工人都要成為領袖，有個人的想法，有個人面對的生活情況，由自己和其他人建立關係。

例如，我們以一個人際關係的課程，宣傳公教職工青年會，由一個工青領袖負責至少八次聚會。我參加完第一次聚會之後，這位領袖跟我一起檢討，我回答他聚會辦得不錯，人人都有參與，大家都頗主動。但他問我：「你有沒有留意到有位女生，整晚默不作聲的。」我作為神師沒看到，但他留意到十六人之中，這位女生有點異樣，建議我多點接觸她。

² 香港公教職工青年會（簡稱「工青會」）成立於 1957 年，是國際性的天主教職工青年組織，總會設於比利時。

這位工青領袖的洞察力果然厲害，原來女孩和父親的關係不佳。這些事情，就要在工青的聚會中看到，然後跟這個人認識、跟這個家庭建立關係，讓這個人有點信心。那位女生後來也成為工青一個小組的領袖。

這些往往不是神父做得到，而是有賴工青會的領袖懂得接觸和留意。我作為神師，只可以陪伴和鼓勵，遇上特別問題便加以協助。而且，香港工青會很多成員不是教友，連領袖都未必是教友，當中只有幾位是教友。

這些工青會的領袖，其實很欣賞教會有生活、行動和祈禱，即是有人的經驗。他們會留意周遭發生甚麼事、問題如何影響人、有問題要跟誰人去改善，以及要有甚麼行動。這些都是長遠的行動，因為不能說一次就解決，至少要一年的時間才能解決。工青會的領袖有他們的課程：培育組員學習觀察、願意行動，以改善關係、生活和環境等。

香港教區在 1991 年成立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簡稱「勞委會」），在籌組的過程中，工青會也獲邀出席會議；然而，華神父對勞委會有獨特的見解。

勞委會是怎樣建立的呢？是因為教會想關心工人而立的。勞委會要找主席，然後職員，有職員才可以執行計劃。而工青會的運作則不同，是工人們自己思考、決定和計劃去做一件事。如果不是這樣，工人未必跟從，也未必來參與活動，而且未必達到培育的效果。勞委會和工青會在理念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隨著香港社會的製造業向中國內地北移，工青會也悄悄起了變化，並在 2013 年 9 月 29 日舉行的五十六周年紀念典禮中，宣布「暫停運作」。

發展讓人建立關係的堂區牧民

華神父在 1994 年開始擔當國際工青會亞太區的神師，直到 2000 年才重返香港的堂區，先後服務於青衣聖多默宗徒堂、九龍灣聖若瑟堂及葵涌聖斯德望堂。工青會的經驗，影響他的牧民方式，以及與教友的關係。

2000 年時，我在聖多默宗徒堂和歐陽輝神父³一起工作，跟青年一起，而且是在職青年的小組。我覺得教會最好就是以小組形式推動，在不同地區發展信仰小團體，教友在聚會當中可以唱歌、分享生活、分享福音和祈禱。

後來我被派遣到九龍灣聖若瑟堂，在那裡去家訪，是很好的經驗，是很值得做的。現在我覺得香港缺少的東西，就是人與人的關係，這不是靠一個電話或 whatsapp 所能做到的。

如果教會不保持與人的關係，發展便沒有意思了。教會內要互相聯繫和支持，彼此分享福音，慶祝生活。堂區的計劃，要與教友一起計劃，做本堂不是做老闆；如果神父要做老闆，教友會怕了他，所以神父和教友一定要做朋友。

³ 歐陽輝神父 (Luigi Bonalumi)，意大利籍，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89 年來港，1993 年在青衣服務。

工人運動裡的酵母

——黃學明

- 1942 年 出生於香港
- 1955 年 入讀香港仔工業學校
- 1956 年 領洗於香港仔工業學校
- 1959 年 加入公教職工青年會（簡稱「工青會」）
- 1961 年 當選工青會副會長，及後多年擔任會長、發展委員等職位
- 1995 年 退休



（圖：黃學明先生，攝於 2018 年）

訪問、撰文：陳樂信

香港在戰後五、六十年代，憑著工業發展，經濟突飛猛進，同時也因為種種的勞工問題，形成了不少勞工組織和活躍的工人運動，為工人充權。

教友黃學明是「公教職工青年會」的資深成員，以工人領袖身份，見證香港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天主教會在當中的參與。從他的故事及所見所聞，亦可以看到一些傳教會為回應當時的社會需要，除了帶來救濟物資，亦傳入了社會運動與社區組織的思想和經驗。

小學階段——左派初接觸

黃學明一家七口居住在紅磡，父親是黃埔船塢工人。黃父把孩子送進左派背景的小學，漸漸發覺學校所宣揚的共產黨訊息有問題，於是黃學明後來轉讀紅磡街坊會小學，遇到當時來實習的司徒華。

當時的香港來說，大家都會知道那個環境，左右兩派政治團體的角力很大。我爸爸在船廠，當時黃埔船塢是很出名的，那裡是共產黨那邊的工會，他們在我們區內都辦了一所學校——勞工子弟學校。我小學的時候，就送了去那裡讀書，讀了三年。

學校給我們的那些老師，我現在可以認識到所謂的統戰工作，做得非常緊密。老師可以和家長打成一片，晚上開設一些興趣班、縫紉班，日間辦一些合作社，跟家長一起做；還有課餘活動，放學後的，老師都和我們一起。

我爸爸發覺，聽來一些訊息，對共產黨沒好感，他知道這學校是共產黨的。於是我讀到三年級，他把我轉到街坊小學，稍為中立一點。當然他在船塢工作，他認識一些稍為有份量的人，在街坊會內有點職位的人，介紹我入讀，在那裡讀了三年。

這三年裡，當然與起初那小學是兩回事，有規模，老師很嚴。讀到五年級，學校不知道從那裡收到訊息，華民

政務司¹想找些清貧學生到香港仔兒童工藝社，即現在的香港仔工業學校，是慈幼會的。我被選中，而家人又讓我去。幾經華民政務司署的面試、篩選等等，媽媽帶著我很多次去中環，最終給我入讀。

我好欣賞我爸爸和媽媽的決定；我是排行第二的，那時實在很窮。華民政務司，即是政府的部門，它看我爸爸一個月可以付多少錢，那裡是寄宿的。

中學階段—教會學校寄宿生活

香港仔工業學校原本是一所兒童工藝學院，於 1921 年設立，由四位華人領袖仿倣外國做法，讓一些因家貧而失學的兒童和青年學習謀生技能。學院於 1935 年建成校舍，同時把管理及教育的重任交予鮑思高慈幼會負責，至 1952 年改名為「香港仔工業學校」（簡稱「香工」）。²在黃學明的記憶中，當時學校的神父都是外國人，也有一些中國人修士負責管理。

我們有分大班、中班和小班，修士跟我們一起，而外國神父當校長、副校長、校監，這幾位都是神父來的，他們的廣東話很好，不用講英文。每晚有晚禱，站在一起，念完經有神長訓話，然後才能睡覺。

因為寄宿，每天有規律、有時間表，早上起身就去聖堂，祈禱、念《玫瑰經》、早課、望彌撒，天天如是。我們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不用上課，下午在自修室，主日就有位神父來講道理，使我們認識天主、天主教。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創世紀》。

我在 1956 年領洗，那時是在聖誕子夜彌撒領洗的，在學校。領洗後，更學做輔祭，當時用拉丁文，彌撒都不知

¹ 華民政務司，為華民政務司署主要官員，早期又稱為總登記官，專責處理華人事務，諸如出入境統計及監督本港華人組織，同時亦為政府建立與華人溝通的渠道。

² 參「香港仔工業學校」網頁：<https://bit.ly/2I9LQuB>。

講甚麼，神父背著我們教友，我想只有我們這些老教友才記得。

當時所認識的天主教，個個都是「鬼佬」，沒有中國人；我認識初期，沒有中國神父，我沒怎麼認識他們。我們學校對面山就是華南總修院，即現在的聖神修院，只知道是培養神父的。

雖然我是在學校聽道理，但我覺得，現在才知道，原來我們是很不足的，和現在的慕道班是完全不同。（背）《要理問答》都有個好處，就是你要識，但不求甚解，有些是解不通的。

踏入社會，加入工青

黃學明自言不擅工藝，未畢業就出來工作，經工青當時的副校長介紹，加入英資公司「香港電話」。離校待業期間，他每天到紅磡聖母堂輔彌撒；至入職後，屬聖母聖心會的本堂神父向他介紹公教職工青年會。工青會與聖母聖心會一樣，都是起源於比利時，是香港首個以藍領公教青年為主的團體。在工青會的參與，成為黃學明認識教會的另一個階段。

我們的公司，不是左派工會，就是右派工會。左派工會是大躍進，58、59年，他們叫些工友去參加歡送會，歡送那些工友辭工回祖國大躍進。我知道，那時有點認識，教會有點暗示，小心不要跟共產黨有那麼多不太好的接觸。我回去問本堂神父好不好，本堂神父沒答我好不好，他只是介紹：「我們有個工青」，介紹我入工青會。

最重要的是，當時教區白英奇主教³，他是米蘭會，

³ 白英奇主教（又名白勞靈，Lorenzo Bianchi，1899-1983）出生於意大利，1923年來港，1952-1969年任香港教區主教，1983年逝世於意大利。他屬於米蘭的郎巴地外方傳教修院；此修院於1926年與「羅馬宗座外方傳教修院」合併，成現在的宗座外方傳教會。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白英奇主教〉：<https://bit.ly/2lu65n7>。

現在的宗座外方傳教會，以及他有一群神父，在不同的堂區。

其實工青會是由慈幼會謝維道神父⁴開始，1957年去羅馬參加第一屆（國際工青）大會，聽完之後，覺得香港是需要做、可以做。當時他率先在荃灣的南海紗廠組織工人，因為那裡有男子宿舍，而且有一位教友科長，也很歡迎有一些教友聚會。

我不知道慈幼會或者他如何交給白主教，交回給教區；後來就有力理得神父⁵從意大利過來，他是社會學博士，是明愛總裁，早期在竹園，由他重新再開始工青。

由堂區開始，向堂區神父介紹工青會。那時每個區都有工廠，工青起初在香港、九龍、新界都有。香港在西營盤和中環，靠嘉諾撒修女那邊，聽說因為嘉諾撒聖心那裡有些孤兒，有些在職的，或者職業學校，去認識那裡的青年。

我們在幾年內發展得很快，在不同的堂區；觀塘是個重點，黃強生、林櫻英修女都是觀塘的。我當時都未搬過來，還在紅磡。其實當時工作沒有分地區，你在那兒住，但未必在那兒返工，哪裡有工作你就去那裡，甚少可以原區返工。

當時荃灣是重點。因為女仔多，拯望會在眾安街開會，聚集女仔；至於男仔，後來也租了個單位，給男仔用的；後來才有荃灣明愛。而九龍區就在紅磡，當時我剛剛認識工青都是在紅磡，亦是它剛剛開始。

在工青的過程中，可以說是另一個轉捩點，對教會更

⁴ 謝維道神父 (Natale Cerrato)，慈幼會士，現居於意大利。

⁵ 力理得神父 (Francesco Lerda)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於1959-64年及1965-74年間擔任工青會神師。

加認識。因為我們每次接受訓練時，我們要訓練的，有普通會員、基本會員和領袖訓練，除了祈禱的經驗，還有《聖經》，讀《聖經》、認識《聖經》、福音，而最重要一點，就是耶穌教導我們甚麼。在那時我們要學「觀察、判斷、實行」，一方面讀《聖經》，第二方面在每次的例會裡，都有一個叫「生活檢討 Review of Life」，每個人講出近況、家庭、工廠，從中你看到些甚麼，然後大家一起商討。

為何我們要用這個方法？第一，認識、了解實況，然後想想，如果耶穌在這個情況下，祂想我們做甚麼。所謂的「see」就是觀察，認識實際環境如何，然後看看教會、法例有沒有抵觸這些事，特別在工廠、工作，最後思考有些甚麼解決方法，有甚麼行動，就是「See Judge Act」。

在工青裡學習這些，也是慢慢成長的，所以一定需要神父，他做一個指導，耶穌在當時，祂會怎樣做。神父也說，我是代表耶穌，在我們工友之間，在這個團體裡，我是耶穌的代表。

六七暴動下的天主教工人運動

1967年，香港的親中愛國左派為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以「反英抗暴」的名義在香港發起工潮，甚至演變成暴力行動，他們以工人階級為主。黃學明提到，香港教會和工青會在當時都是沒有角色的，而當時參與工青的神父釐清工人運動與工會之間的分別。

有些微矛盾的，不過當時我們的討論，神父對我們說，工會是工會，它是一個合法的代表，我們可以的話，最好加入工會，但當時的工會是左派工會，你很難加入，亦不想加入。

我們只有在工友之間接觸，認識一個真正的工會，怎麼團結，或者有行動時，大家如何互相知道情況。甚至在大罷工時，人造膠花廠，我們工青會已經進入了這些不同的機構，我們電話公司也有靜坐，我們領袖有時也有幫手，都認識這些事。

我印象最深是，六七暴動之後，政府開始有一些社區中心（疏導青年），給他們有些活動、學習的機會，在荃灣雅麗珊郡主中心，當時荃灣明愛中心開始。當時的理民官⁶和我們的神父好熟悉，神父和政府的關係都十分良好，他邀請我們派一些青年領袖去那邊接觸青年，這也是很大的參與社會和政府。

工人運動在全球各地均被視為左翼份子，教會人士，尤其是神父，常會有所避忌。按黃學明的經驗和觀察，在香港教會裡這並不算很明顯，但一般認為基督徒是不應該參與有政治色彩的行動。

當時的神職人員對於工人的情況、所需要的東西，他們都不太認識。很幸運，教區一早委派了一位總指導司鐸，然後每個堂區的支會都有神師，否則我們真的很迷茫。

當時力理得神父，因為他是社會學家，他的層面會闊一點，或者他和主教的溝通，使主教認識。但我猜想，那時大家都是摸索，除了力神父，大家都是摸索。但是我們相信，我們基督徒，祈禱、學習《聖經》，幫助我們很大。

⁶ 理民府的首長，是英人租借新界初期的重要行政機關，早年集警官、地方法官和土地官於一身。1982年政府實施地方行政，各區的理民府改為政務處。參陳天權：〈新界理民府〉，《大公報》，2013年10月11日。

教會參與爭取勞工權益

「工人司鐸運動」的興起，加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稱「梵二」）帶來的新氣象，鼓勵了不少神父走入基層的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於社區發展工作的前線及爭取勞工權益的運動中，亦不難發現外國神父的蹤影。

在梵二之後，一方面有些神父還俗，一方面開放了，不少神父到工廠打工，接觸工人。其實華神父（華天祿）、甘仔（甘浩望）之前也有，例如區神父，區成賢、萬籟寂神父，甚至恩保德。⁷

70年以後才開始有瑪利諾會，主要在盲人工潮。瑪利諾會幾位神父，包括戴能皓神父⁸，他們組成了「勞工輔導組」，黃強生在那裡幫手。他們會去勞工處，代表工友。

勞工輔導組比較積極，因為見到當時教會都無能為力，沒有全職的人，如何關心工人？如何接觸工人呢？即使我們做領袖，是在工廠裡做而已，在行動上我們做不到很多。他們神父則不同，可以和全職職員一起工作，方便得多，也懂得怎麼處理。那幾位瑪利諾神父真的影響很大。

⁷ 華天祿神父（Paul Vallat）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甘浩望神父（Franco Mella）、萬籟寂神父（Mario Marazzi）和恩保德神父（Giovanni Giampietro）均屬於宗座外方傳教會，而區成賢神父（Francis G. Elsinger）為教區神父。他們現在仍在香港服務或居住。

⁸ 戴能皓神父（又稱戴南海，Thomas E. Danaher，1934-2012）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屬瑪利諾會，1962年來港。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戴能皓神父〉：<https://bit.ly/2IKyAfK>。

後期就是孟家華神父，他組織了「勞資關係協進會」。⁹ 這位神父可能認識一些大學生，是知識份子，他來找我們，因為他要想做事的話，一定要有成員，要基層。他跟我們合作辦活動，他們出錢，我們找人，因為事實上，我們也沒有經費去辦大型活動。我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龍蝦灣燒烤。

但是，我們都看到，即是我們所認識到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個理念，只有職工青年才了解職工青年的問題，只有職工青年才能解決職工青年的問題，即是其他人幫不到你，這是我們工人青年的職能，或者是我們的使命，這是工青的精神。因為你不在其中的話，你不理解實況，你亦不能做到甚麼深入的工作，只有理論，要靠我們幫忙。

黃學明後來又認識了「亞洲社會經濟促進會」，學習由耶穌會士郭樂賢神父引入香港的「儲蓄互助社」¹⁰ 的理念，由自己生活的屋邨開始，再帶入公司實踐，這成為他在工青會以外的另一份重要經驗。他有感：「犧牲、承擔、分享這些字眼，只有在參與當中，才可以看到、學習到那一份樂趣。」

我在青年運動、工人運動裡是酵母，那時未學到地上之鹽、世界之光，未到這些，只是酵母，發揮一個催化。

⁹ 孟家華神父 (Patrick Terence McGovern, 1920-1984) 是愛爾蘭耶穌會士，在 1947 年來港。他成立的勞資關係協進會成立於 1968 年，是政府註冊認可的非牟利勞工團體，亦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團體成員。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孟家華神父〉：<https://bit.ly/2DnklK0>。

¹⁰ 郭樂賢神父 (John Collins, 1912-1997) 出生於愛爾蘭，1937 年來港。他引入的儲蓄互助社是一種非營利金融機構，集合會員的儲蓄作投資，定期派發利息回報，亦向會員提供低息貸款。據「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網站，儲蓄互助運動在六十年代初傳入香港，天主教徒為成員的聖方濟各儲蓄互助社是於 1964 年成立的首個此類組織。郭神父是協會創辦人及永久顧問，目前有十二個天主教堂區設有互助社，受相關條例監管。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郭樂賢神父〉：<https://bit.ly/2Gxqpqw>。

敏於回應時代的轉變與需要

—— 鄭生來神父

- 1941 年 出生於牙買加
- 1958 年 任教於高主教書院
- 1964 年 入讀聖神修院，66 年往羅馬修讀神學
- 1970 年 晉鐸，出任香港聖若瑟堂助理司鐸
- 1972 年 出任西環聖母玫瑰堂助理司鐸
- 1975 年 創立「優良電影介紹小組」
- 1979 年 創辦《驛》
- 1983 年 成立「信仰探討中心」，自 89 年以「天主教綠色傳人」推行生態環保



(圖：鄭生來神父。圖片來源：天亞社中文網)

訪問、撰文：黃奕清

由回應聖召、當上神父，到後來創辦不同團體和關注生態，鄭生來神父都在實踐一份「不離地」的信仰。正如他說，自己一直都是「看著事物的演變，看著所需要的，而去回應。」

中國人身份意識的萌芽

我爸爸是在香港出世的，鄉下在淡水，客家人。淡水很多人都出去第二處，他的弟弟去了牙買加，做生意，他安定下來之後，就叫了我爸爸過去。我爸爸是中醫師，他便過去做中醫師。

爸爸比我大很多年，大我五十幾年，那時他已經接近六十歲，那時六十歲已屬老年。他弟弟離世時，他們用馬車送殯，我陪他坐馬車。我坐在爸爸身旁，他哭得很厲害，他跟弟弟很「老友」¹的。然後，他說要回來，想著要落葉歸根。他想到自己年紀大，都不會有多少年了，他想在國土死，為他香港也是國土，那就回來。

父親的這份鄉土之情，除了把鄭神父一家帶回來香港，也在鄭神父的心裡，埋下了一顆關懷祖國的種子。

始於香港的信仰生活

鄭神父的母親是牙買加人，與鄭父在牙買加結婚。夫婦二人雖然都不是天主教徒，卻把剛出世的孩子們都帶去領洗，鄭神父估計是由於母親在當地認識的一位耶穌會神父。而鄭神父對教會的印象與認識，都是在六歲隨家人來到香港定居後才開始。

我大哥去了德肋撒堂當輔祭，我就跟了他去做輔祭，那是第一次接觸教會和信仰。最主要的是去輔彌撒，做輔祭

¹ 廣東話，要好的意思。

都做得很開心。不知何時開始，每朝早去輔六點半彌撒，由東頭邨行去。

在那裡，影響我最大，而且最深印象的，是基督；在彌撒、祈禱和福音中，基督的印象是最深的。覺得祂是服務人，所以那裡都影響很深，即是服務，基督和服務。

堂區生活讓年紀小小的鄭生來漸萌修道之意，希望像神父們般服務。可是，人愈是成長，做神父的意念愈是淡化，為甚麼呢？

開始覺得神父與社會脫節，與人脫節。即是那時長大一點，就有這種感受，覺得都不太是基督那樣，基督是跟人接觸的。

在神長們的關心和多番提醒下，鄭神父中學畢業時，還是約見了修院院長，同行的還有兩位好友。這一行，卻是適得其反。

做神父的想法已經淡了，去到之後更差了。那位院長，那時他們穿長袍。我們在等他的時候，在房間內有講有笑，然後他接見我一個。他說：「你見不見到我穿黑袍？」我答：「見。」他說：「我們穿黑袍，是表達我們特別的身份。如果做神父，身份是高一點的，比教友的身份高一點的。」

然後他說：「你是否常常去旅行之類？」那時我是輔祭和歌詠團團員，有時我們也會去旅行。他說：「如果你想做神父，你要開始考慮，跟教友有少少隔膜，因為身份高一點，以及不要去那些東西那麼多。」

我立即決定，我不入去，在心裡面，我決定不入。我已經在想，神父跟人、跟社會有點脫節，去了修院還更加疏離了。不是說完全不入，但是傾向不入。

尋求與回應天主的聖意

那是 1958 年。剛巧高主教書院開校，鄭神父在堂區認識的祁良神父 (Giuseppe Carra)² 去當校監，邀請未有甚麼打算的他去當教師。鄭神父補充說：「他都是其中一位提我有聖召的。」

從事教學工作五年多的鄭神父，雖然享受跟學生的相處，但他仍然想著天主的意思是甚麼，再次思考未來的發展。於是他安排了一連十日，課後到公教進行社的小堂祈禱。這一次讓他清楚自己的意向，遂向學校辭職，正式踏進修院，那天是 1964 年 3 月 31 日。

梵二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是 1965 年。高主教的校監有一份刊物，是英文的，報道梵二。他收到之後，看完之後，便寄給我。梵二的內容，忘了入修院前有沒有看，但入修院後，收到時便看，其中一份談修院教育 (《司鐸之培養法令》) 。

我見到覺得不錯，便問同學，有沒有興趣討論這份東西；他們說有，那我說：「好吧，我介紹吧。」我們坐在一起討論，都討論得不錯。但是，忘記了在討論甚麼，校方有人叫我們散會。我忘了在討論甚麼，他不喜歡，使得大家都很不開心。

² 祁良神父 (1921-1991)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46 年在意大利晉鐸，曾在中國河南省傳教，至 1953 年來到香港，在 1954 至 1958 年間服務於聖德肋撒堂。祁神父在教育方面的貢獻尤其傑出，他 1958 年創辦高主教書院，自此的 33 年間，一直擔任該校校監。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祁良神父〉：<http://bit.ly/2G1gd2Q>。

即是，入修院後，梵二已經開始影響我。我又可能幸好有梵二，因為梵二給我另外一個教會觀。那時教會是內向的、關閉的，教宗在梵二之前已經說，我要開個窗，讓新鮮空氣進來，不知道他有沒有說開門，但也有這個意思，要出去，即不是只是向內，要向外。

根本我是不想入修院，但是要做神父，就一定要經修院，那就入了，要做神父沒辦法，我只想「快快趣趣」³讀完，做神父就算了，所以我對修院並沒有期望。看梵二的這些，為我是很好，而且也是我的需要。

梵二是很重要，如果沒有梵二，我不知自己會怎樣了。

羅馬假期⁴

鄭神父也果然是「快快趣趣」，哲學課程讀兩年就完成了，然後被安排到羅馬升讀神學課程。

後來，香港開始考慮派神學生到羅馬讀，不知是否做了試驗品，派了我去。66年。關俊棠、夏其龍就一早去了，他們去讀哲學。之後那幾年，出外讀神學的都是派去羅馬，後來停了，然後派去台灣，然後又停了。即是香港的神學院停了，所以派出去；香港神學院重開後，就停派神學生出外。

³ 趕快的意思。

⁴ 「羅馬假期」是《公教報》的一個專欄名稱，於1970年2月6日、3月6日和3月13日這三期刊出，是羅馬港區修士的集體創作，分享他們在暑假期間不同的進修學習或生活體驗。

當時教會剛剛有梵二，開始有新的，但又仍有些舊的。在（羅馬）修院有幾位教授比較開放和先進，但仍是舊的制度，修生都有點亂，修生都要改變，負責人未必想改變，或者思想有點不同，所以修院也有點亂，但都有幾位很好的教授。在那裡可以多方面接觸到不同的思想，不同類型的事物都可以接觸，以及在暑假可以自己周圍去。

當時令鄭神父深受啟發的其中一次經驗，是一個為期三周、關於宗教社會學的暑期課程。那是 1968 年。

我以前小時候，即未入修院之前，是基督、信仰、祈禱和個人實踐。中學時，天主處處都在，即是天主在周圍，空氣裡、樹裡，處處都在，這在中學那時已經很深刻。教書的時候，以及之前也是，個人及個人的成長，教書時是心理學、心理成長。

因為家裡窮，所以耶穌很關心窮人，這為我就很強烈。要解釋貧窮，單單做慈善工作，是解釋不到的；單單做社會工作，即是福利工作，又解釋不到；愛德工作，又是解釋不到。1968 年那次的課程，就是可以解釋為何貧窮存在，是甚麼導致它存在。原來要解決它，就是要社會制度的改變，在那裡有很大的得著。即是，多一個層面去看。

當時又是一個有很多不同神學興起的年代，其中鄭生來神父就看了很多關於解放神學的書籍。在這段時期的學習和思想啟蒙，影響了鄭神父往後的各種選擇。

解放神學其中一個特點，除了社會分析，它都強調社會分析，它也強調貧窮；其中特別的是，它強調實踐，神學是由實踐做反省，即不是搬書本，又不只是一個學究式的神學，是要信仰實踐的反省。

解放神學也有很多的，其中之一，是 conscientization，意識培育，或者意識省覺，即是說，要破除貧窮，破除不正義。它都很強調低下層、基基團⁵；拉丁美洲的基基團運動，是他們反思自己生活上的種種，以及他們要做的事，要爭取的東西，不斷以《聖經》做反省，以及常常講突破、釋放和解放。

Conscientization，不是每個人都這樣說的，其中有些，即是最主要的人。就是說，你跟你對立或者對抗的人，目的都是要他覺醒，即是說，不是要打倒他，是要他覺醒，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要打倒對方，你就不全面了。如果你要對方覺醒，你未必做到，但你的目的不是打倒那人，是要他覺醒。意思就是，如果你令他覺醒，你就是打倒了他，但不是要消滅他。我覺得這點很重要，以後的社會運動很多時欠缺這樣。這是基督徒的，但甚至教會社會運動，都是欠缺這個，是要打倒人，他是你的敵人，沒有愛敵人的存在。

耶穌基督是由上而下，降生成人，然後帶我們上去，他由上而下，然後跟下面一起上。於是這方向很重要，由

⁵ 基基團，全稱基層基督徒團體，香港天主教會亦稱它為「信仰小團體」。它是教會中的最基層組織，被認為是培育教友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見徐錦堯著，〈活力小團體——基基團聚會手冊〉：<http://fr.luketsui.idv.hk/>。

上而下，意思是，要帶上層的人體會下面的人。如果上層的人不體會下面的人，如果教會只看上層那些，就不全面。但如果由下面看，就全面了，因為看下面，是一定也看上層。但你看上層，未必看下面。那上層的人要變成怎樣呢？變成他們懂得下來，以及懂得體會下面。

基督徒在上層，不這樣做的話，就是有所欠缺。所以基督徒上層的人，一定要關心下面的，配合基督。關心下面的，是要與基督、與人一起上，即是帶人上，不是可憐人，但要人上去，這才是真正的關心。所以，福利工作只是可憐式，或者是施捨式，就不夠徹底了，是要讓人可以上去。不一定要上去上層，但要在他的欠缺之中提昇。

我回來香港，跟關俊棠、夏其龍一起升神父。我們在羅馬已經想，我們不在大堂（主教座堂）升神父，次次都是去那裡，不去！找一個窮的堂區升神父。我們又不知哪裡，最終想到聖老楞佐堂，我們都不大清楚，好像是窮的堂區。我們討論，大家同意，就寫信給徐誠斌主教⁶，他接受了，於是就在那裡升。

我們就是如此選擇。我們也選擇回來升的，而不在羅馬升，想在香港升。我們回來後，也舉辦很多講座，關於梵二。

⁶ 徐誠斌主教（1920-1973）出生於上海，1959年在羅馬晉鐸，回港後出任《公教報》主編，其後任公教真理學會主任、公教進行社社長及香港教區對外聯絡處主任等要職。他在1967年獲委任為教區輔理主教，翌年任教區署理主教，1969年正式成為教區第三任主教，是香港首任國籍主教。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徐誠斌主教〉：<https://bit.ly/2Gtcr2H>。

在堂區與教區開展新事物

我是想去一個窮堂區，然後是講中文的堂區，卻推了我去一個英文堂區。

那是 1970 年；鄭神父首個服務的堂區，是花園道聖若瑟堂，那裡的教友大都是外籍人士，只有少數華人。

在那裡要思考（教會）本地化，那裡完全是英文彌撒。我問，想不想在舊曆新年有一台中文彌撒，他們說：「好啊！好啊！」

那時我是副本堂，但本堂放大假，徐主教跟我說，現在他不在，給你負責，但又不想公開你是暫代本堂，即是仍然是副本堂，但事實就是負責。

定了這台彌撒，在《堂區通訊》登了，說舊曆新年加開一台中文彌撒。突然接到一個來電，他問：「為何有中文彌撒？」我說：「有甚麼問題？」「我們是英文堂區，傳統上是英文彌撒。」我說：「中文彌撒有甚麼問題呢？是新年，也為中國人。」他說不可以，是傳統。我說，我沒有改任何東西，只是加東西，即我沒有改原有的彌撒，只是加。他說也不可以。

他是外國人，在香港很久，而且有很多中國朋友，在堂區很久。我說，沒法子，這台彌撒是一定會開的，以及你這樣是歧視。他說要告向主教，我說沒辦法，因為我真的沒改甚麼。他真的去告了！

徐誠斌「叻」。徐誠斌跟他說：「這是你堂區的事，如果你有這些事，你去跟堂區議會說。」然後，他就去堂

區議會說，堂區議會責斥說：「誰准許你去主教那裡？你沒有問過我們，你自己去了。這台彌撒我們沒問題。」

就這樣，聖若瑟堂舉行了第一台中文彌撒。

七十年代中，一齣瞬間落畫的音樂劇《歡樂福音》，啟發鄭神父在 1975 年成立「優良電影介紹小組」，分享好的電影。七十年代後半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剛好教宗向中國招手，又有北京主教表示願意聯繫，鄭神父又看準時機，在 1979 年創辦《驛》，嘗試「以朋友接觸朋友」的方式，透過出版與中國教會彼此分享訊息。

愛主愛人愛大地

今天，鄭生來神父是香港天主教會關注生態環境的代表人物。其實，在中學時期已感受到「天主處處都在」的鄭神父，早於七十年代初在西環聖母玫瑰堂的時候，已經開始做收集舊報紙、舊衣物等環保工作。至八十年代，他創立「信仰探討中心」後，意識到需要全面地去看整個生態，於是又開展一個新組織——「天主教綠識傳人」。那是 1989 年。

八十年代尾，覺得要開始一個組織，剛巧在黃大仙，找一些人聊，要幫手想個名字。大家商量，有個男孩子說，「綠色傳人」，顏色的「色」，最好聽的就是這個名字。我說好，但不要顏色的「色」，要意識的「識」，因為我仍然是想 conscientization，就用這名字成立了。

邁向八十歲的鄭神父，從來沒有停下來，近年他推動「愛主愛人愛大地」，提出了《天主經》的問題。

《天主經》有甚麼問題呢？就是「奉行在人間」，「人間」的問題。因為，我看過全部，所看過的《天主

經》全部都是「地」，舊版是「承行於地」，《聖經》裡的都是「地」，只有白話文版是「人間」。

「人間」，如果從歷史上看，即是宇宙歷史來看，人的存在是很短時間。你看「量」，人的量是很小。那天主的旨意，奉行在人間，講細小的範圍，把天主的旨意，局限在這細小的範圍。「承行於地」，就至少是一百三十七億年，人只是數十萬年。而且，這麼多樹，這麼多動物，天主的旨意不在那裡嗎？天主的旨意不是一直在運行嗎？

因為《聖經》是「愛主愛人」，但信仰是隨著時代而變得豐富，為二十一世紀的生態危機，以及教宗都說了，對大自然和造物主的責任和義務是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⁷ 如果《天主經》講來講去都是「人間」，沒有了「地」，那如何把「地」加入去，即如何叫人強調愛大地？

他感嘆說，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了好幾年，可是「寫的信、寫的文章，都沒人理睬」，未來要再大力一點推動。他就是既敏於洞悉時代徵兆，又勇於作出信仰回應的鄭生來神父。

⁷ 這理念由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1990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提出，教宗方濟各在2015年發表的《願祿受讚頌》通諭中重申。

信仰之路，譬如行遠，必自邇；
譬如登高，必自卑

—— 范錦棠神父

- | | |
|--------|------------------|
| 1946 年 | 出生於香港 |
| 1964 年 | 進太古樓小修院 |
| 1978 年 | 晉鐸 |
| 1981 年 | 到羅馬進修，約一年後回港 |
| 1989 年 | 到加拿大修讀傳教學碩士課程 |
| 1991 年 | 回港，在聖方濟各堂及其他堂區服務 |
| 2011 年 | 調派至聖雅各伯堂服務至今 |



(圖：范錦棠神父，攝於 2018 年)

訪問：陳樂信、黃奕清
撰文：加俾爾

成長路是人生路，人生路也是朝聖路。在人生路上，我們常常像是在迷霧中行走，遠遠望去，前路是一片濛濛，辨不出方向狀況。於是，我們遲疑、我們駐足。當我們終於鼓起勇氣向前走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其實每走一步，都能將下一步的路看得更清楚一些。每個人都有一條屬於自己的路要走，對范錦棠神父而言，回應天主在他身上的召喚，在生活的實踐中，逐漸領會上主的旨意，一步一步地跟隨、實行，便是他生命與信仰的依歸。

范神父認為人生路和真實道路的差別，在於人生路不是鋪設好、死板板的道路，而是錯綜複雜會隨著我們的步伐逐漸向四面八方開展。《中庸》曰：「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唯有往前走，路才會誕生，才會存在。

孕育於太古樓的信仰

1946年，范錦棠出生於香港，少時在「太古樓」露德聖母堂受洗。他1978年6月10日在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晉鐸，屬於香港教區的神父，1989至1991年於加拿大渥太華攻讀傳教學碩士學位。范神父曾服務過的堂區包括善導之母堂、聖方濟各堂和聖保祿堂，現任為聖雅各伯堂主任司鐸。

孟母三遷：「昔孟母，擇鄰處。」生活環境對人的成長及品格的養成至關重要，范神父年幼時居住在薄扶林村，就讀聖華學校¹，毗鄰是一間法國古式的聖堂露德聖母堂，附近是有教友村之稱的太古樓。聖堂每日在彌撒開始前都會敲幾次鐘。晨鐘定省，范神父從小便是在宗教氛圍下成長。據他憶述，家中最早認識天主的是大家姐，姐姐領洗後，全家人在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影響下，都先後領洗了。

¹ 聖華學校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在1951年創辦，由來自法國的外方傳教女修會負責管理和教導。學生主要是居住在太古樓、薄扶林村、草寮以及鋼線灣一帶的兒童，校舍於1978年遷到沙田禾輦邨現址。

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經濟環境十分惡劣。幸好，爸爸是一位廚師，收入尚算穩定，加上「近廚得食」，家中可以說是三餐無憂；在那年代，社會上的熱心人士都會透過教會捐助物品給有需要的人，其中包括日用品和衣物，經過分類、整理、縫補後，會送贈給貧苦大眾。由於當時的生活艱苦，很多人都是依賴教會的救濟品補給過活，正因為這原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反而變得互助互愛、緊密和諧。信仰的種子也在不知不覺間萌芽生長。

現今香港是推行十五年的免費教育，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不管是幼稚園、小學或是中學，讀書都要付學費的。在生活條件仍是三餐不繼的情況下，想讀書確實非易事。范神父能夠順利完成中學課程，全賴家人對他的支持，以及他自己所付出的努力。

聖召種子之萌芽與成長

回顧四十年的鐸職生涯，范神父形容對他影響至深，引領他一步步走進信仰之門，並且令他甘將一生奉獻、踏上聖召之路的人，是明之剛神父²。這份影響不單只在信仰，還有做人處事之道。

明之剛神父屬巴黎外方傳教會，是昔日太古樓露德聖母堂的主任司鐸。對當時年紀尚幼的范錦棠來說，神職人員就是那些整天穿著中國傳統黑長衫，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高高大大的外國人。

明神父的一言一行、所說的話都很有道理。他仁慈、有愛心、又喜歡幫助人。村內的居民很敬重他，特別是年

² 明之剛神父 (Rene Chevalier · 1909-1981) 是法國人，在 1942 年晉鐸為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二戰結束後來華傳教。他在 1952 年被迫離開大陸來到香港，任薄扶林露德聖母堂主任司鐸，服務該堂區十九年之久。他在 1971 年調任聖神修院神師職，至 1980 年任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翌年回國休假途中，在探訪泰國邊境難民營後遇車禍喪生。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明之剛神父〉：<https://bit.ly/2VHKRVL>。

青人和小朋友都很喜歡親近他。「容孩近我」（瑪 19: 14）相信就是這般的意思罷！

露德聖母堂每年都舉行幾個大型活動，明神父會帶著一百幾十名村民，扶老攜幼浩浩蕩蕩由薄扶林村、太古樓出發，徒步經瑪麗醫院，沿山路往下走到大口環療養院、兒童院……做探訪。期間除了關懷問候病者、安慰憐愛孤兒弱小、送贈生活必需品外，很多時候眼見被探訪的人穿得太單薄或衣衫過於殘破，明神父甚至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也脫下送給他們。「白白得來，白白分施。」（瑪 10: 8）明神父那捨己忘我的行為，實在令人折服。

那時候我很小，不知道這些是愛德工作，看到姊姊去，自己便跟著去。有一次，我雙腳行得腫了起來，明神父便揹著我「騎膊馬」³繼續向前行。在途中遇到賣甘蔗的小販，他便賞給我們一人一支甘蔗以作鼓勵。我依稀記得，當時我一邊騎在他的膊上，一邊咬著甘蔗。結果，我吃得滋味，但明神父就被我弄到滿面蔗汁，狼狽不堪。這點點滴滴的片段，令我體會到傳教士犧牲的精神，他們對福傳的堅毅熱忱。「非爾役人，乃役於人。」（瑪 20: 28）

其實，外國傳教士到香港傳教一點也不容易，他們離鄉別井，要克服語言的障礙，適應生活文化上的差異。明神父所屬的修會為了方便他到不同的地區服務、傳教，提供了一輛「福士」汽車給他代步。可是，除了出外探訪，大多數的時候，他的汽車都是用來服務區內的村民。有些

³ 廣東話，一個人坐在另一個人肩膀上的動作。

人借來當花車用，有些人借作十字車用途……遇到緊急的情況，明神父甚至會充當司機接送人去醫院。

在訪談的過程中，范神父告訴我們他一生熱愛收集不同的面譜，藉以接觸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種族。面譜像人的容貌各有不同，但在每人的臉容下，各有獨特的一面，當中隱藏著基督的容顏。而他在明之剛神父的臉上看到了主耶穌的面容——克己犧牲、謙遜仁愛。

走上兒童、學生運動之路

范神父坦言，他從小在宗教氣氛濃厚的環境下長大，加上明神父的悉心教導、以身作則，在信仰上可說是他的啟蒙老師；正因為這些原故，令他深深明白到紮根信仰，必須自小培育。在過去的數十年裡，范神父一直致力於青少年牧民工作，而他個人在年少時已經是「樂鋒會」的活躍分子。

「樂鋒會」IMAC，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the Apostolate for Children，是一個國際運動。它源於法國，香港萌芽的基地在太古樓，我年青時是「樂鋒會」的小領袖，入小修院之後，每年暑假都會抽空去參加和協助「樂鋒會」籌辦的南丫島生活營，期望透過遊戲、生活體驗，令這群青年學生以「觀察、判斷、行動」的方法，了解、分析和反省生活現況，從而作出信仰的回應。

《樂鋒報》就是為了配合這個運動而發行的，內容主要有故事、遊戲、手工創作的的方法、集郵園地，以及「樂鋒會」的最新資訊。這本刊物有中英文版本，除香港以外，也會郵寄到東南亞的國家，是一本益智的青少年／兒童刊物。

後來，范神父去了羅馬讀書，返港後「公教學生青年會」（YCS·

Young Christian Students) 的幹事聯絡他，於是范神父便成了學青的神師，同期他也曾任理工及柏立基師範學院的神師。

由於樂鋒會和學青的參與，范神父經常要走訪東南亞出席一些國際會議，因而有機會認識了解其他國家的傳統文化，開闊眼光和知識的領域。在加拿大攻讀碩士期間，他曾探訪不同地區的傳教士，學習他們如何傳教；畢業後，范神父在非洲居住了兩個月，對當地的傳教士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加拿大讀書期間，曾有人向范神父提出幫他辦理手續，邀請他留下來傳教，但范神父說：「生於斯長於斯，香港更需要我！」婉言拒絕了對方的好意。

魯迅曾說：「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當心中已有堅定的目標時，就應該勇敢邁開步伐。「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唯有往前走，才有可能抵達。

教會與文化

